

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

詹姆斯·西伯奇著

供内部参考

蘇
聯
出
現
在
拉
丁
美
洲

詹
姆
士
·
西
伯
奇
著

PDG

33.773

207

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

〔美〕詹姆士·西伯奇 著

辛华季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017515

新
知
三
联
书
店

PDG

National Strategy
Information Center, Inc.
The Soviet Presence in
Latin America

James D. Theberge
Crane, Russak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4

根据纽约克兰劳萨科公司1974年版译出

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

(美)詹姆斯·西伯奇 著

辛华季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5印张 67,000字
1976年7月第1版 197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2·179 定价0.29元

内部发行

新华书店

内部发行

PDG

出版说明

《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这本书，介绍了苏修对拉丁美洲的扩张和渗透，勾划了两个超级大国在西半球争夺的轮廓。书中援用了必要的材料，对苏联和拉美国家关系的历史，苏修对拉美进行扩张和渗透的目的、手段、得失和前景，作了论述。其中一些论述和材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詹姆士·西伯奇是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室主任，同美国国务院关系密切，立场和观点是反动的，阅读时请注意分析和批判。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俄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	3
第二章 苏联外交.....	15
第三章 苏联的贸易和援助	20
第四章 苏联的间谍和颠覆活动	29
第五章 莫斯科支持革命的暴力	40
第六章 同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关系	51
第七章 同古巴的关系：冲突与和解	60
第八章 苏联海军力量出现在加勒比海域	71
第九章 苏联外交的主要目标：智利与秘鲁.....	78
第十章 苏联进展得失的总结.....	95
附录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和极左派的状况.....	100

序 言

俄国卷入拉丁美洲的事务，是较近的事态发展。沙皇的外交政策对相距遥远的地球这一角落几乎一点也不注意。1917年以后，俄国的新主人共产党设法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促进革命。但是，即使对他们说来，拉丁美洲也不是一个很优先的目标。更加有希望得多的革命机会在其它地区招引着他们。确实，克里姆林宫曾努力在整个拉丁美洲创建忠诚而又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但是，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拉丁美洲才变成苏联的野心所向的一个较重要的目标。

在这本专题著作中，詹姆士·西伯奇先生分析了战后苏联对拉丁美洲政策的演变。他着重剖析了克里姆林宫用来推行其政策的主要手段：传统外交（这种外交近几年来得到苏联海军在加勒比地区日益频繁的出现的的支持）、贸易和援助、间谍和颠覆活动以及对革命暴力活动的有选择的支持。其中一章专门叙述了克里姆林宫同拉丁美洲各共产党和其它革命政党的关系。还详尽地研讨了莫斯科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以及新近消逝的智利阿连德政府和依然在台上的秘鲁革命军事政权打交道的情况。

西伯奇先生指出，莫斯科在拉丁美洲的当前目标依然是极为有限的：“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扩大苏联的势力，保卫‘社

会主义的”古巴,并削弱美国的依然占优势的地位”。这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政策,“其意图在于扩大苏联的势力而不冒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苏联人分明知道,他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指望在这个地区建立政治优势。

另一方面,莫斯科的长远抱负也是最清楚不过的,即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谋取政权。据作者判断,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地位,尽管依然“远远没有达到威风凛凛的地步”,“今天已比十年前巩固了”,而且正在变得更加巩固。而且,俄国人看来要继续作出这种步步为营的努力来改变力量对比。“尽管出现缓和,在莫斯科方面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它要放弃那种对于拉丁美洲出现的变革,只要可以用来反对美国,就都要加以利用的政策。”对美国地位的这种逐步侵蚀所包含的终极含义在未来的年代中必将引起华盛顿决策者的严重关切。

西伯奇先生在乔治城大学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工作。他撰写并讲授过一系列拉丁美洲政治和经济问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在他出版的其它著作中包括《俄国在加勒比》。他还是《苏联在加勒比的海上力量》、《政治和战略含义》的特约编辑,《加勒比的稳定》的特约撰稿者。他在1964—1965年任哈佛大学的利塔沃学会会员,1966年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特别顾问,1957—1958年任海德堡大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学会会员。

国家战略情报中心主任

弗兰克·巴尼特

1974年6月

第一章 俄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

直到不久以前，俄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还很小。沙俄在十八世纪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在十九世纪同新独立的一些拉丁美洲共和国只有非常零星和稀少的接触。^①当俄国的前沿贸易点从阿拉斯加沿太平洋岸南下时，它先后使墨西哥的西班牙总督和独立后的墨西哥的新统治者感到震惊，他们害怕俄国人打肥沃的上下加利福尼亚省的主意。^②但是，除去这种南下的侵扰和偶尔对这个地区派出科学远征队之外，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俄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关系。^③它在1885年才同阿根廷、在1887年同墨西哥、在1890年同乌拉圭建立了外交和贸易联系。拉丁美洲离俄国本土太远，在战略上也不重要，总之，这个地方的油水少得

① 费奥多尔·卡尔扎文，作家兼翻译家，在拉丁美洲呆过一个时期的第一个俄国人。他在1782—1784年期间曾访问古巴。弗朗西斯科·米兰达，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领袖之一，旅游过俄国，后来成为凯瑟琳大帝的宠儿。参阅维克托·沃尔斯基，《苏联对拉丁美洲的研究》，载杰·格雷戈里·奥斯瓦德，《苏联心目中的现代拉丁美洲——历史文献汇编，1960—1968年》，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第13页。

② 参阅斯蒂芬·克利索尔德编著，《文件一览：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1918—1968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页。

③ 十九世纪中，俄国确曾同巴西发生了关系，然而当时巴西不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是葡萄牙的布拉甘沙王朝的一个支系统治下的君主国。

不足以引起沙皇的政客们的认真注意。

在1917年革命以后，沙皇的外交政策格局被布尔什维克的救世主般的勃勃野心所取代。诚然，拉丁美洲在这些抱负中并不占有突出地位，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新的苏维埃领导面临着急迫得多的革命任务。^①而且，“美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力量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处于创始阶段，对共产党进行革命并不有利。拉丁美洲没有完全被忽视；但是莫斯科更感兴趣的是利用拉丁美洲来影响英国和美国在其它地区的政策，而不是在当地发动革命。

当地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分支的建立以及1924年的同墨西哥建立外交关系，为增进苏联的利益创造了新机会。^②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墨西哥共产党在中美洲培植共产主义方面干得远比在墨西哥本身成功，在墨西哥，当地人民显然宁愿自己搞革命，而不要苏联的援助。往南，苏联的影响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有了某些扩展，特别是在阿根廷那里的共产党是加入共产国际的第一个拉丁美洲共产党。193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共产国际南美洲书记处，并赋予它扩大苏联的影响和监督向这个大陆的南部地区输入代理人的任务。^③

① 姆·恩·罗伊，《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346页。

② 墨西哥是第一个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拉丁美洲国家，乌拉圭两年后（1925年）效法墨西哥。

③ 在斯蒂芬·克利索尔德：《两次大战之间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一文中，详尽讨论了战争间隙时期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该文载杰·格雷戈里·奥斯瓦德和安东尼·杰·斯托弗编著：《苏联和拉丁美洲》一书，纽约：普雷格公司，1970年版，第15—20页。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莫斯科的政策的目的旨在创建当地的忠诚和纪律严明的共产党，通过正常的外交和贸易途径扩大苏联的势力，并侵蚀英国和美国的优势地位。然而，现已周知，这项政策由于试图把莫斯科的外交政策的利益同当地的党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狭隘的宗派主义态度调和起来，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的到处插手的极左策略不仅成效甚少，而且造成苏联同墨西哥（1930年）、阿根廷（1930年）、智利（1932年）、巴西（1936年）和乌拉圭（1936年）的外交关系的破裂。但是，即使当时苏联执行更为灵活的政策而且共产国际采取不那么极端的策略的话，俄国是否会取得大得多的进展，也还是令人怀疑的。在拉丁美洲不存在革命的形势。尽管发生了某些人民骚乱，拉丁美洲传统的上层人物及其军队中的同盟者仍然牢固地驾驭着局势。

在俄国革命后的头二十年中，人民政党的产生、带来激进社会思想的欧洲人的移入、战斗的劳工组织和改良主义的中产阶级的领导的出现以及农村贫民的大量流入城市，在拉丁美洲引起了政治和社会骚动事件。这种局势看来有助于产生激进政治团体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是苏联却无法加以利用。莫斯科对这个地区的无知、它对拉丁美洲文化和传统的轻蔑态度以及共产国际对这个地区共产党的指示的教条式的僵硬性质都对事情的发展不起好作用。但是主要的问题却是苏联深陷于自己国内的问题之中，而拉丁美洲在苏联的要事单子上根本不名列前茅。而且，在三十年代，拉丁美洲得风气之先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更倾向于选择德国的纳粹主义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而不是俄国的共产主义。

在创建忠诚和纪律严明的当地共产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少数的党在选举中取得一些成功。在智利,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组成促进了一个人民联合阵线的建立,这个阵线在1938年使激进党及其总统候选人佩德罗·阿基雷·塞尔达执了政。这样,智利成为(继法国和西班牙之后)由人民阵线统治的第三个国家,从而表明了共产国际的战略甚至在遥远的地区所具有的活力。尽管在两次战争之间取得的成果是微弱的,还是奠定了扩大宣传工作的基础,并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社会中取得了可贵的经验。

表一 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创建

国 家	年 代	国 家	年 代
阿 根 廷	1918	委 内 瑞 拉	1931
墨 西 哥	1919	波 多 黎 各	1932
乌 拉 圭	1920	巴 拉 圭	1933
智 利	1922	尼 加 拉 瓜	1939
巴 西	1922	瓜 德 罗 普	1944
古 巴	1925	马 提 尼 克	1944
洪 都 拉 斯	1927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1944
厄 瓜 多 尔	1928	玻 利 维 亚	1950
危 地 马 拉	1931	海 地	1959

资料来源:格·恩·柯罗梅茨编著,《拉丁美洲国家政党》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1955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一个短期中(1941—1947年),苏俄和当地的共产党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苏联和西方大国在战时建立的同盟改善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并为苏联

扩大同拉丁美洲的外交往来提供了方便。^① 在莫斯科指导下，当地共产党支持盟国进行战争，并利用自己的影响来防止罢工和对战时生产的破坏。但是在1947年开始的冷战很快就扭转了这种趋势。由于斯大林激烈批评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它们同美国的密切联系，并要求当地共产党公开宣布它们对苏联的忠诚，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战时对苏联的善意很快地消散，外交关系断绝了，这些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

斯大林的僵硬政策和当地共产党在冷战高潮中的不妥协性使得俄国在此期间几乎不可能同拉丁美洲国家合作。斯大林似乎确信，在苏联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没有中间立场可言。曾经出现过的要改变这种僵硬立场的少许迹象，甚至在斯大林逝世以前也有过。但是，只是在1953年以后，才明显地看出它已经重新制订基本政策，这时，俄国再次开始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外交、贸易和文化联系。

苏联当前的目标

莫斯科当前在拉丁美洲的目标是容易说明的：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扩大苏联的势力，保卫“社会主义的”古巴，并削弱美国的依然占优势的地位。为达到这些目的，苏联一直准备同民主分子、独裁者和极端激进的革命者合作，即使他们积极反共也罢。莫斯科对于卡斯特罗早期的桀骜不驯，表现了很

^① 1939年，莫斯科同任何拉丁美洲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到1946年，它同十三个国家建立了关系，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影响和威信达到了新高峰。

大的容忍，并对在巴西和阿根廷发生的对共产主义的镇压视而不见。当前，它宁可要一个执行对苏友好的外交政策的反共政府，而不要一个抵制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言听计从但本质上反共的政权，象秘鲁的贝拉斯科军事独裁政权，看来比铁托的南斯拉夫更能适应苏联当前的企图。

从1962年导弹危机起，赫鲁晓夫在拉丁美洲的冒险主义已为一种较为谨慎的政策所取代，用以扩大苏联的势力而不冒同美国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莫斯科采用了一整套配合得很好的政策手段：外交、宣传、间谍活动、政治煽动、革命暴力、军事和经济援助，甚至海军力量。苏联当前正在把一种设法同资产阶级政府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的更为积极的“传统”外交，同一种大量扩建战略军事力量和频繁出动海军以支持它的外交活动的作法结合起来。它还在“意识形态和具体使命”方面加强了对当地共产党和外围团体的指导，并对革命暴力活动给予了更多的隐蔽的支持。

意识形态方面的立论

苏联把拉丁美洲视为在第三世界占有特殊地位的地区。这是一个存在着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地区，然而这里缺少为取得共产主义胜利所必需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武装斗争并非作为一般原则而遭到反对，而只是由于它取得成功的前景不大，并由于不成熟的夺取政权的尝试可能给俄国民族利益带来种种不利影响。拉丁美洲的落后状态要求有一个“过渡阶段”来为社会主义复兴准备政治和经济基础。莫斯科

认为,这个地区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必须先经历一个“人民民主”革命阶段。

虽然苏联对拉丁美洲的看法在意识形态上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所左右,但它对逐个国家的研究却表现得越来越牵强附会。苏联著作中的大多数分类是把拉丁美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加勒比地区被看作一个具有不能一概而论的特点的地方。在莫斯科看来,它是美国的“战略后方”中最敏感的地带,是拉丁美洲不久前遭受美国军事干涉的唯一地区。它还被看作同美国保持着特别密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的地区。

在苏联对拉丁美洲的当前战略中,当地共产党被要求在左翼联盟、激进革命政府、甚至“进步”军人政权中发挥突出的作用。这种战略要求共产党参加人民阵线联盟,渗入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阶层,并使群众动员起来和激进化。在东西方缓和时代,它还要求苏联通过一种不危及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方式对拉丁美洲革命运动提供支持。

莫斯科并不幻想亲苏的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联合阵线策略“和平”执政,或不经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暴力行动实现这一点。1973年9月戏剧性地推翻智利社会党—共产党联盟这件事非常清楚地表明,“和平道路”面临重重困难。由于发生智利事件,拉丁美洲军事和民主政治领导人比以前更清楚地意识到苏联和古巴的干涉。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分裂,“左翼和民主力量的团结”依然不过是句口号而远非现实,这种情况使得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复杂化了。

在阿连德在智利取胜后的一段时间里，看来好象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选举道路可以在本地区的其它地方取得成功。但是俄国人在支持阿连德方面表现得相当谨慎小心并对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成功前景表现得疑虑重重。乌拉圭左翼联盟（广泛阵线）的候选人在1971年总统选举中的败北、1973年9月的智利军事政变以及1973年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中左翼联盟（新力量）的得票寥寥无几，都表明选举道路在拉丁美洲遭遇难以克服的障碍。

当前，莫斯科看不出共产主义在任何拉丁美洲国家有早日取胜的前景。现在它赞成从联合政府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以便把它承诺的政治和经济义务限制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次成功的革命将使苏联有责任去保证这个新的共产党政权得以生存下来，而这将大大限制苏联的回旋余地。莫斯科愿意看到这些国家在共产党接管以前在资金积累和发展方面能够达到自立的水平，以便使这些新的共产党政权有较大的机会生存下来而不会向苏联提出使它感到为难的要求。在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这种情况是明显的。由于深深陷入古巴的事务而花费巨大的苏联，后来鼓励阿连德从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资金，采取一种自助政策而不指望苏联的大规模援助。

合法的和革命的斗争方式

尽管苏联和听命于莫斯科的拉丁美洲共产党强调“合乎宪法”或“合法”的斗争方式，莫斯科的政策本质上是机会主义

的，它囊括了所有的斗争方式——和平的或暴力的、合法的或非法的、单独进行的或联合进行的——须视当地政治条件所造成的机缘而定。当地的亲苏的党被告知，假如不能和平取得政权，它们必须随时准备“迎接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包括武装斗争）。

每当和平的斗争方式（然而它并不排除阶级斗争甚至使用暴力）可望获得成功或取得成就的时候，苏联就主张采取这种斗争方式，而当武装斗争看来可能失败的时候，它就谴责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冒险主义”。在诸如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这样的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被堵塞，莫斯科就准备考虑以革命暴力作为一种可行的变革手段。但是，采取了精心的预防措施来掩饰苏联策动内部颠覆和革命暴力的行径。只要有可能，莫斯科总是使用古巴和东欧代理人去从事一旦失败就会置苏联于尴尬境地的那些高度危险的行动。它能够这样作，是因为苏联对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匈牙利和在一定范围内对罗马尼亚的情报机构的控制是如此严密，以致不管实际任务是什么，它们都不过是苏联情报部门的延伸。^①

莫斯科在向拉丁美洲扩大其影响的活动中既有机可乘，也碰上问题。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强大经济和文化影响有利于莫斯科。它已经使美国成为当地致力于独立发展的民族主义者的头号目标和搪塞他们自己的棘手问题的替罪羊。经

^① 参阅约翰·巴伦，《克格勃》，纽约，读者文摘出版社，1974年版，第22页；奥尔兰罗·卡斯特罗·伊达尔戈，《非德尔的问谍》，迈阿密，西曼出版社，1971年版，第62—63页。

济民族主义的高涨、对跨国公司活动施加的限制、左翼军事独裁的出现、在许多国家中的强大民粹主义倾向以及1970年联合战线战略在智利的暂时成功，看来也对莫斯科有利。莫斯科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已经削弱华盛顿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支配地位，并为进行思想渗透提供了风险最小、代价最低的新机会。

在当前的苏联战略中，从战术角度很强调利用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为的是加强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培植同莫斯科的紧密关系。苏联人希望加强“民族资产阶级”（即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者）的反帝潜在力量并从中取利，这个阶级感受到外国资本入侵的威胁，因而愿意同共产党集团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以抗衡美国的影响。民族资产阶级可望渐渐地不再相信外国投资真能给他们带来技术进步、工业发展和较高的生活水准。在拉丁美洲的军界、官僚、技术界和上层知识分子中，反对美国 and 外国资本的分子被认为特别容易响应共产党的“反帝”宣传，他们被当作潜在的盟友而记录在案。

中产阶级中的民族主义阶层被看作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背后的决定性力量。莫斯科相信，一个由共产党、左翼和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力量组成的联盟——它们为反对日益增长的美国经济势力而联合，又为社会进步的缓慢速度所挫伤——将在和平的政治竞赛中最终取得政权，或通过同“进步的”军事政权的合作取得决定性影响。这些政权，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那时将在为摆脱美国而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寻求苏联的支持。

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的事实在七十年代比十年前更加清

晰可见了。莫斯科对古巴投下很大的资本，并把它的威信作为赌注押在卡斯特罗政权的存亡上。俄国人还在贝拉斯科政权统治下的秘鲁和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发挥相当大的影响；而阿根廷的“民粹主义”的庇隆政府和巴拿马的军事独裁政权似乎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但是苏联的政策也碰上严重的麻烦。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持续处于衰弱状态并不是一幅宣扬共产主义的效能好的广告。当莫斯科还没有深入地卷入拉丁美洲事务的时候，它恰恰由于表面上是一个对这个地区没有特殊利益或责任的遥远的旁观者而享有某种威信。可是当俄国人更多地卷入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活的时候，那种不动私心的利他主义的气息开始消失了。对苏联的民族主义疑虑已经达到相当程度，而且预料要继续增长。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者很想利用苏联来反对美国，但是他们也很想避免重复制古巴的以顺从苏联取代对美国的依赖的错误。此外，建立附庸国是要付出某种代价和冒某种风险的。一旦陷入这种关系，要想摆脱义务和减少花费，那就困难了。莫斯科既然已经向古巴提供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达十年以上，现在不能干脆断绝这种支持，不管这样干花费多么大，从长远看前途又多么渺茫。人们认为，智利的军事政变是苏联的一次失败，而莫斯科的不肯援助阿连德政权则是承认自己的软弱。

至于将来，苏联将继续设法加强它在西半球的地位，并巩固它对古巴的控制。但是各种因素将会抑制苏联采取更加冒险的政策。在这些因素中，包括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应所包含的风险和种种现在还难以逆料的情况，也包括某种激进的政

策可能对苏美关系产生的影响。莫斯科还必须考虑对这个地区承担进一步的经济和军事义务可能带来的物质损耗，以及苏联在西半球的军事地位的必然弱点。

第二章 苏联外交

六十年代以前，莫斯科同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充其量也不过是很有限的，而它同本地区国家扩展关系的努力经常以垮台而告终。例如，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俄国只同它们之中的三个国家（阿根廷、墨西哥和乌拉圭）有正式的外交关系。^①

在乐观的赫鲁晓夫年代里，莫斯科变得更加乐于勾引第三世界，于是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联系。^②然而，直到卡斯特罗在古巴取得政权并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后，拉丁美洲一直处于次要地位。莫斯科军事、经济和技术能力的增强也使苏联有可能在当前对拉丁美洲执行一种更加积极的政策。另一方面，东西方紧张局势的缓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左倾趋势的出现、当地争取工业化和寻求新的出口市场的努力、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敌对态度的旷日持久、以及摆脱华盛顿而取得较

^① 参阅斯蒂芬·克利索尔德：《两次大战之间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第1—59页；格雷戈里·奥斯瓦德：《苏联同墨西哥、乌拉圭和古巴的外交关系》一文，载唐纳德·赫尔曼编著《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浪潮》一书，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5—115页。

^② 雷蒙德·邓肯：《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奥尔比斯》季刊第15卷，第2期（1971年夏），第643—669页。

大程度的独立的愿望，所有这些都刺激着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对恢复同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发生兴趣。卡斯特罗的古巴是在1960年第一个同苏联重建全面外交关系的国家，巴西在1961年追随于后，智利是在1964年。^①哥伦比亚在1968年效法前者；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在1969年；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在1970年；哥斯达黎加在1971年。到1970年，除巴拉圭外，苏联人已同所有南美国家有了外交关系；它在加勒比地区采取的外交攻势则稍逊一筹。^②

苏联明显地期望通过扩展外交、经济、科学和技术联系，使拉丁美洲国家断绝同美国的密切关系，并鼓励它们采取一种更加中立的外交政策方针。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莫斯科鼓励拉丁美洲参加不结盟国家的会议（例如1973年9月的阿尔及尔会议），鼓励拉丁美洲同亚非两洲协调关于商品出口价格的政策，鼓励它们对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限制，对外国企业的财产实行国有化，并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就巴拿马和波多黎各的问题采取反殖民主义的立场。

同外交方面作出的努力相配合，莫斯科增加了对拉丁美洲的贸易和援助。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有时加速了经济交流。在另一些时候，如以最近的哥斯达黎加为例，情况恰恰相反。莫斯科购买哥斯达黎加的剩余咖啡，打开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道路。苏联人巧妙地暗示，同他们进行贸易

① 苏联在1973年9月同智利断绝关系，作为否定推翻阿连德政权的军政委员会的一种姿态。

② 直到1973年底，莫斯科同巴巴多斯、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尼加拉瓜、巴拿马或特立尼达仍然没有外交或领事关系。

可以为拉丁美洲的商品打开一个新的巨大市场，并从而减少它们对美国的依赖。然而，比起苏联在诸如中东和亚洲等另外一些地区所作的努力，这种贸易和援助的规模一直是很小的。

七十年代早期东西方紧张局势的缓和强有力地影响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针。它破坏了那种为了把苏联、古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拒于门外的冷战理论，并且预示着只要采取和解的态度便可得到政治和经济实惠的报偿。目前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不象以前那样严重地把苏联和其它共产党国家视为“共产党的威胁”，而是更多地把它们视为潜在的有价值的贸易伙伴和提供迫切需要的资金和技术的来源。例如，据人们判断，对秘鲁军政权说来，这个国家旷日持久的经济和社会落后状态对国家安全所形成的威胁比苏联的颠覆严重得多。而且，苏联援助政策的许多方面对拉丁美洲国家说来确是有吸引力的，如：摒弃直接投资、无条件地承认当事国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愿意以技术交换原料。除此以外，同苏联和古巴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特别当时还辅以“反帝”的花言巧语，那就时常有助于安抚国内的左翼激进势力。

在拉丁美洲，同共产党集团建立关系曾一度被当作一种行使国家主权和摆脱华盛顿独立行事而加以张扬，它大大博得人民的支持，并改善了有关国家同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例如，在六十年代初期，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和海地的“老大夫”杜瓦利埃的反共政权曾经发出过威胁：如果美国不更加优待它们，它们就将转向苏联。在东西方关系有所改善的尼克松—基辛格时代，这类威胁不太灵验了。美国的政策已不再反对苏联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政治和经济联

系。不管是什么国家，一旦它承认了共产党国家，这种“独立姿态”的政治价值很快就丧失殆尽。

在六十年代，莫斯科同诸如哥伦比亚和巴西这样的反共国家的外交和经济联系明显地使它同古巴的“特殊”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到六十年代末期，这种局面完全改变了。卡斯特罗本人也转而采取了使古巴摆脱孤立状态的策略，放弃了眼下在拉丁美洲能够触发亲卡斯特罗的革命的愿望。哈瓦那表示了新的愿望：首先同那些表明自己独立于美国的“进步”政权（诸如阿连德的智利和贝拉斯科的秘鲁）、最后甚至同诸如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反共的加勒比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用来操纵哈瓦那的经济手段的加强以及游击队战略在拉丁美洲的明显失败使得卡斯特罗推迟了本大陆的革命，并把古巴更紧密地附在莫斯科的和平共处和同资本主义国家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上。

日益增多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现在承认了古巴，或者表示了这样作的兴趣。智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取得政权后随即在1970年11月承认了古巴，阿连德总统并敦促其它拉丁美洲国家无视美洲国家组织的制裁。1972年7月，秘鲁也承认了古巴；1972年12月，四个加勒比地区的英语国家——巴巴多斯、圭亚那、牙买加和特立尼达——宣布恢复同卡斯特罗政权的外交关系。阿根廷在1973年5月效法这些国家。巴拿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哥斯达黎加表示了不同程度的重建关系的兴趣；巴西也在重新估价对古巴的政策。但是，1973年9月智利军政委员会由于哈瓦那在阿连德执政期间干涉智利内部事务同哈瓦那断绝关系，这种承认卡斯特罗的势头在

1973 年底暂时有所减弱。

加勒比地区的许多西班牙语国家离古巴近得多，也更加暴露于卡斯特罗支持的颠覆活动之下，它们继续支持美洲国家组织的封锁。只要卡斯特罗坚持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这些国家就觉得不应该单独或多国同时放弃这项在外交和经济上予以孤立的政策。它们要求卡斯特罗停止执行他的现行的哪怕已有所收敛的干涉政策，作为重新接纳古巴进入美洲国家组织的必要条件。而在卡斯特罗方面，他曾多次宣布古巴将绝不重新加入美洲国家组织。在今后数年内，华盛顿和哈瓦那并非绝不可能采取某种行动来实现关系正常化，这种行动显然会有效地结束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孤立状态。此外，在它的带动下，哈瓦那逐步地重新纳入现存的或经过修改的西半球体系的进程可能将得以开始。

拉丁美洲相当一部分人知道，苏联、古巴和东欧的大使馆甚至在和平共处的时代也从事颠覆活动。苏联和共产党集团的使团的过分庞大的人员配备以及共产党“外交官”干预拉丁美洲国家内部事务的一贯性，经常造成舆论哗然，政府反应激烈，甚至驱逐有关的外交官员。但是俄国最近取得的外交和贸易进展表明，人们远不象以前那样对莫斯科心怀恐惧了。同共产党国家开展关系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好处目前总的看来超过了为之可能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

第三章 苏联的贸易和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对外贸易显著增长，但是大部分局限于社会主义集团。苏联同拉丁美洲的贸易，除古巴以外，仍然是微不足道的。确实，拉丁美洲是苏联最不重要的贸易区域，它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中东、非洲和亚洲。1972年，苏联同拉丁美洲的贸易略有减少，从1966年的一亿八千六百万美元降到一亿二千六百万美元。阿根廷和巴西占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二以上。莫斯科给秘鲁贝拉斯科政府的经济援助将在七十年代中同该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额中得到反映。除古巴外，拉丁美洲国家在同苏联的贸易中有顺差，而古巴在同苏联的贸易中长期有赤字，近年来这种赤字平均每年约三亿美元。

苏联同拉丁美洲贸易的时增时减的格局反映了存在于莫斯科同该地区的贸易关系中的很大的政治机会主义的成分。莫斯科经常在某种特定出口商品（例如，咖啡或食糖）有剩余时一次买上一批，为的是获得诸如外交承认这样的政治利益。当然，并不是全部苏联贸易都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苏联也购买它所需要的货物，例如从巴西购买食糖，同时为了支付进口商品的价款而出口。但是，许多重要的交易，特别是经济援助计划促成的贸易往来，只能从非经济考虑得到解释。

同拉丁美洲的贸易的低水平也是由如下的事实造成的：

一般说来，苏联不太需要拉丁美洲国家出口的许多原料和粮食。事实上，苏联是许多同类商品的出口国，或拥有更多的和价格较便宜的供应来源。此外，记录否定了莫斯科这样的说法：集中计划的经济较之自由贸易的周转提供更为稳定的贸易。在贸易额上，苏联同拉丁美洲的贸易较之西方同拉丁美洲的贸易具有波动更大的特征。唯一的例外是莫斯科的古巴附庸国。

人们广泛认为，苏联的贸易和援助由于财政条件宽厚（利率低和偿还期限长）以及可以用本国产品来偿还而对第三世界有吸引力。这些偿还条件受到欢迎，因为它们可能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付差额问题得到缓和。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发现，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有失有得。用本国商品偿还的办法表面上是有吸引力的，但这种办法同时减少了可以用来出售给西方国家的商品的供应，从而减少了可兑换货币的收入。从苏联信贷援助的较为优厚的条件中得到的好处，也由于这些信贷规定要以购买质劣或不适用的苏联货物为条件而大大地减少了。此外，价格上的歧视（例如，莫斯科经常高估它的援助物资的价格而低估用来还债的货物的价格）大大地减少了苏联对拉丁美洲援助的经济价值。大部分西方援助附有类似的条件，但通常并不造成这类不利。

从1958年到1965年，发展中国家用来支付购自苏联的商品的钱较之用来支付从西方工业国家购买的同样商品的钱平均要多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不仅如此，根据双边贸易安排，苏联用来支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的钱较之它本来要在世界市场上支付的钱平均少百分之十到百分之

表二 苏联同拉丁美洲(不包括古巴)的贸易 (1960—1972年)

(单位:百万美元)

	成交额①	出 口	进 口	差额②	拉丁美洲在 苏联贸易中 所占份额
1960	76	42	34	+ 8	0.7%
1961	66	32	34	- 2	0.6%
1962	110	41	69	- 28	0.8%
1963	101	41	60	- 19	0.7%
1964	84	31	53	- 22	0.5%
1965	167	51	116	- 65	1.0%
1966	186	58	128	- 70	1.1%
1967	80	27	53	- 26	0.4%
1968	98	27	71	- 44	0.5%
1969	124	35	89	- 54	0.6%
1970	87	13	74	- 61	0.4%
1971	124	19	105	- 86	0.5%
1972	126	22	104	- 82	0.6%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商业部国际贸易分析编辑部编制的官方统计。

十五。^③事实上,苏联同它的受援国和贸易伙伴之间的交易正是它极为严厉地批评西方所从事的那种苛刻的“资本主义”交易。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萨尔瓦多·阿连德引以为憾地发现的那样,苏联并不向它的朋友随便提供可兑换的硬通货储备,以使用来支付从西方进口的诸如粮食、零件和机器这样的急需进口物资。

莫斯科在开展贸易和提供援助方面的做法消除了这样的

① 苏联出口加进口。

② 苏联出口减去进口。苏联逆差(-),顺差(+).

③ 詹姆斯·卡特:《苏联对外援助的实际支出》,纽约,普雷格公司,1971年版,第39—41页。

看法：苏联在同社会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的交往中已经采取了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的和更为进步的形式。在共产主义世界（包括古巴）内部，苏联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对待弱国以一种典型的统治力量的姿态行事。最近几年来，古巴一直在苏联要取消援助的威胁下，受到要它改变对内外政策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压力。在同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则必须表现出大得多的容忍。尽管如此，莫斯科的贸易和援助经常附有政治条件，或最终成为引诱或迫使它们对苏联作出让步的手段。例如，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加纳、芬兰和伊拉克都是受援国，它们由于遵循莫斯科所不赞同的政策而受到惩罚或威胁。^① 经济协定成为一种用来建立苏联贸易和技术援助代表机构、谈判文化和科学合作协定、训练学生和为了实行政治渗透而在一些战略要地安插技术人员和代理人的方便的手段。^② 技术援助代表机构，例如被安插在智利铜矿工业中的苏联技术人员（他们的薪金由阿连德政府以美元支付），也被用来刺探工业情报。^③

古巴是苏联在拉丁美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迄今为止接受苏联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从1960年到1973年，苏联给古巴的经济援助，包括支付差额信贷、技术援助费用、工程信贷和食糖补贴，累计总数约五十亿美元。苏联的军事援助还有二十亿美元，这样，就使苏联到1973年年底为止的经济

① 马歇尔·戈德曼：《苏联对外援助》，纽约，普雷格公司，1971年版，第196页。

② 美国国务院情报和调研局：《调研备忘录》，1972年9月18日。

③ 据智利铜公司副执行董事长安德烈斯·佐希古里奇1973年12月向作者提交的一项声明。

和军事援助总额估计达到七十亿美元。

苏联对古巴在贸易上欠的越来越多的债特别感到不安，1972年，这种债款达到二十三亿美元。古巴偿还贸易债款的前景是不妙的，由于支付苏联运给古巴的原油的花费急剧增加，估计古巴在七十年代的贸易债款将迅速增多。在世界石油价格急剧上涨以前，莫斯科每年(1972年)供给古巴大约一亿美元的原油；但是所供应的石油的价值在1975年可能上升到约

表三 苏联同古巴的贸易 (1960—1972年) (单位: 100 万美元)①

	成交额②	出口	进口	差额③	古巴在苏联贸易中所占份额
1960	176.6	73.9	102.7	- 28.8	1.6%
1961	592.9	284.1	308.8	- 24.7	5.1%
1962	594.8	363.1	231.7	+ 131.4	4.5%
1963	558.6	395.8	162.8	+ 233.0	3.9%
1964	647.4	362.3	285.1	+ 77.2	4.2%
1965	710.5	371.7	338.8	+ 32.9	4.4%
1966	758.1	475.1	283.0	+ 192.1	4.5%
1967	926.4	557.4	369.0	+ 188.4	5.1%
1968	893.0	618.0	275.0	+ 343.0	4.5%
1969	847.1	617.8	229.3	+ 388.5	3.9%
1970	1149.5	638.0	511.5	+ 126.5	4.7%
1971	802.6	542.3	260.3	+ 282.0	3.1%
1972	679.1	509.3	169.8	+ 339.5	3.2%

资料来源：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手册，1918—1966，以及在这之后的对外贸易年鉴。

① 1971年全年，卢布同美元的兑换率是1比1.11；1972年，卢布同美元的兑换率是1.21比1。

② 苏联的出口加进口。

③ 苏联出口减去进口。苏联逆差(-)，顺差(+)。除1960年和1961年，苏联同古巴的贸易每年有顺差。

七亿美元，在 1980 年可能超过十亿美元。可以理解的是莫斯科想把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减少到最小限度以便苏联有石油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来换取硬币，并鼓励古巴恢复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这些进口石油用在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中所取得的外汇收入来支付。

从 1954 年到 1972 年，莫斯科承诺提供发展中国家八十三亿美元的援助（信贷和赠与），但只有五亿四千八百万美元（占总数的百分之六点六）是给予拉丁美洲的，这个数额的一半左右是给巴西和智利的。在七十年代初期，莫斯科把它提供的援助集中在智利和秘鲁。

但是，在苏联大肆宣扬的对经济援助的承诺和实际提交的物资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由于价格上的歧视，特别由于提交援助物资的工作完成得差劲，苏联承诺的援助的经济价值大大地减少了。在 1971 年年底，苏联提交的援助物资计三十六亿美元，比它承诺要给的少一半多。一项协定签订之后，接着而来的往往是耗费时间的研究实施计划和试点工程。拖延和履行协定的低效率也成了交货少的原因。有时，供应的货物不适合当地情况，或者设计有缺点，质量低，缺少零件。缺乏开办工程时所需要的当地货币以及在同莫斯科的累赘而又低能的国家贸易官僚机构打交道时遇到的困难，也拖延了援助物资的提交。例如，智利在 1967 年宣布了两笔信贷，总数是九千七百万美元，其用途是建设一些整套的工厂以及进口机器和设备。四年之后，这些信贷仍然没有动用。其它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国家有着类似的经验。尽管对经济援助的承诺作了大肆张扬并吹嘘了“兄弟般的无私援助”，莫斯科实

表四 苏联对依地理区域划分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信贷和赠与①(1954—1972年)

年份	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		中东		总数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1965	28	15	66	34	15	8	84	
1966	77	6	660	53	85	7	422	34	1,244
1967	9	3	5	2	97②	31	200	64	311
1968	0	0	194	52	2	1	178	48	374
1969	135	28	20	4	20	4	301	63	476
1970	51	26	11	6	56	29	76	39	194
1971	192	22	214	24	62③	7	418	47	886
1972	0	0	195	32	181④	29	242	39	618
累计数									
1954—1964	760	19	1,814	45	30	1	1,429	35	4,033
1965—1972	492	11	1,365	32	518	12	1,921	45	4,296
1954—1972	1,252	15	3,179	38	548	7	3,350	40	8,329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情报和调研局编：《共产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2年的援助和贸易(1973年6月15日版)。

- ① 赠与只占经济援助的百分之五。
 ② 这些数字与国务院的材料不符，其原因是，根据智利官方提供的数字，苏联给智利的援助有所增加。
 ③ 同上。
 ④ 同上。
 附注：由于以整数计算，区域性的百分比总数加起来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际提交给发展中国家的物资是惊人地少。

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逐年有巨大波动。这种援助由 1970 年的一亿九千四百万美元上升到 1971 年的八亿八千六百万美元,但在 1972 年下跌到六亿一千八百万美元。苏联领导人看来了解到经济援助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局限性。这种援助往往证明是无效的或产生反作用。它绝不能保证得到持久的友好态度,却不时导致令人难堪地卷入当地或地区性的纠纷,而政治上的报酬可能是短暂的,或同投下的本钱不相称。俄国人在向拉丁美洲提供援助时所表现的小心翼翼的态度一直是受到国内的经济困难、缺乏外汇以及诸如在中东承诺的其他花费大的国外负担的影响。

莫斯科正对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以便利用拉丁美洲的原料和能源储备,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义,“帝国主义”(即美国)的力量出于它对第三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的控制。苏联领导显然认为,用鼓励没收美国人在采矿和工业方面的投资的办法,可以严重地削弱美国。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取得对拉丁美洲资源的控制,甚至也不是不让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取得这些资源。它的主要目的是使西方丧失对原料和能源的直接所有权和控制。莫斯科把自己装扮成无私的朋友和反对“帝国主义”报复的保护人,去鼓励这种作法。这并不意味着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是按莫斯科的意志行事的代理人或走狗。他们是独立行事的人,苏联企图同他们联合一起来损害美国的利益。但是,莫斯科同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的联盟是不稳定的,可以从它(在 1968 年以前)同卡斯特罗的关系和同贝拉斯科统治下的

秘鲁的关系中看到这种情况。

苏联也正在设法使它的援助计划比过去更为有效。这导致同受援国一起更为仔细地联合规划和实施援助项目。在将来，可以预见苏联将会有选择地参与原料的联合生产为提供对外援助交换原料，甚至在原料加工方面建立伙伴关系。尽管援助在目前还处于低水平，莫斯科正在争取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莫斯科可能认为，一项协调和实施得好的经济渗透计划将在拉丁美洲取得持久的政治影响，虽然绝不能肯定结果必然如此。在过去，同苏联打交道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广泛接触生活并不一定能够结成持久的友谊。

第四章 苏联的间谍和颠覆活动

尽管莫斯科强调和平共处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苏联继续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积极参与大规模的秘密活动。莫斯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使它能够大大地扩大由它的大使馆和其它官方代表机构指挥的颠覆和情报活动。

在五十年代，当时苏联在拉丁美洲只有少数几个使馆，每隔两三年，就有苏联使馆官员由于进行间谍和颠覆活动而被这个或那个国家驱逐出境。从1968年起，苏联大使馆和其它代表机构的数目增加了，随之而来的是被驱逐出境的人数的明显增加。目前，每年都有若干苏联官员被一两个国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从1945年到1973年，约有八十名苏联外交官和其他官员被九个拉丁美洲国家驱逐出境。另外有一些苏联官员，有一个消息来源估计为二十人，按照同苏联政府作出的特别安排被要求离开驻在国，因为他们的干涉行为变得过于明显了。^① 仅仅在1968—1973年这一期间，就有六十三名苏联官员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乌拉圭在1968年9月驱逐了三人；墨西哥在1969年1月驱逐了两人；阿根廷在1970年11月驱逐了两人；厄瓜多尔在1971年7月驱逐了三人；墨西哥

^① 波哥大《世纪报》，1971年4月20日。

在1971年3月驱逐了五人；玻利维亚在1972年3月驱逐了二十五人；^①哥伦比亚在1972年8月驱逐了三人；智利在1973年9月驱逐了二十人。^②被驱逐的苏联官员中包括外交官、非外交使团人员（厨师、技术人员、贸易和军事官员）以及塔斯社、消息报、国际旅行社和莫斯科电台等官方机构的代表。这样，战后苏联官方代表被驱逐出境或被要求离开驻在国的到目前已经超过一百名，其中大多数驱逐事件发生在最近，即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控告苏联外交官进行了非法活动，诸如煽动罢工、参与学生暴动和政变活动、招募和训练当地特务、散发敌对宣传品、资助恐怖和间谍活动以及训练城市游击队。当然，苏联并不是先进国家中唯一搞间谍活动的国家。但是苏联克格勃（秘密情报和警察组织）的规模日益庞大的活动——它的行贿、拷问、暗杀、绑架、破坏和造谣技术——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望其项背的。由于莫斯科充分利用了苏联在拉丁美洲扩充它的官方人员而得到的新机会，克格勃在拉丁美洲的活动的规模和效果近年来都明显地扩大了。在成功地巩固了在古巴的地位以后，苏联改组和加强了它在西半球的情报和宣传网。当前在这个地区执行任务的苏联克格勃官员比较年青，受过较高的教育，见识较广，西班牙语也说得较流利。他们比之战后初期的前任要老练和有效率得多。

^① 路透社拉巴斯1972年3月29日电。这些苏联官员的另外九十四名家属于1972年4月离开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政府声称，被驱逐的苏联官员犯有“干涉玻利维亚内政”的罪行。

^② 驱逐二十名苏联官员，大致和莫斯科决定中断外交关系同时发生。

表五 苏联官方代表团在拉丁美洲从事间谍和颠覆活动而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① (1964—1973年)

年 月	国 家	姓 名
1973 年 9 月	智利 ^②	阿列克谢·阿法纳斯金 尼古拉·吉科夫 鲍里斯·杰米涅 维克托·叶弗列莫夫 格曼·戈列洛夫 米哈尔·伊萨耶夫 尼古拉·科查诺夫 阿列克谢·库拉索夫 瓦西里耶·维斯·洛克索夫 瓦列里·诺扎罗夫 尼古拉·佩列斯 弗拉基米尔·波利亚科夫 阿列克谢·波兹尼亚科夫 维克托·谢戈夫 瓦列里·谢尔戈耶夫 维克托·索斯索夫 瓦西里耶·斯捷潘诺夫 亚历山大·契尔诺斯维托夫 维克托·沃罗涅斯 瓦西里耶·扎哈罗夫
1972 年 8 月	哥伦比亚	盖纳吉·卡尔波夫 格奥尔吉·胡尔巴托夫 鲍里斯·曼图科夫

① 包括苏联外交官,其他非外交官大使馆人员(例如技术人员和贸易官员),和苏联官方机构的代表,如塔斯社、国际旅行社和莫斯科电台。

② 这些苏联官员中约有十二名官员是在靠近瓦尔帕莱索的一家由俄国人盖的工厂内的雇员,他们是同训练城市游击队有关的军官;其余是同一厂内的技术人员,所有这些人连同十二名家属在 1973 年 9 月 11 日事变后不久被智利军事委员会驱逐出境。

年 月	国 家	姓 名
1972 年 4 月	玻利维亚①	尤里·萨赫宁 伊戈尔·肖洛霍夫
1971 年 7 月	厄瓜多尔	罗别斯比埃尔·菲拉托夫 瓦伦丁·戈罗金 阿纳托利·沙达林
1971 年 3 月	墨西哥	亚历山大·鲍尔沙科夫 德米特里·佳科诺夫 鲍里斯·科洛姆耶科夫 奥列格·涅奇波伦科 鲍里斯·沃斯科鲍伊尼科夫
1970 年 11 月	阿根廷	尤里·马蒙托夫 尤里·里耶鲍夫
1969 年 1 月	墨西哥	维克托·米达尼科夫 弗拉基米尔·谢维耶夫
1968 年 9 月	乌拉圭	维克托·格拉托夫 阿纳托里·拉迪金 格奥尔吉·马图欣
1966 年 10 月	乌拉圭	尼古拉·伊凡诺夫 弗拉基米尔·什维茨 谢尔盖·扬加金 阿列克谢·朱丁
1966 年 4 月	巴西	维塔列耶·科别什
1964 年 12 月	哥伦比亚	米哈尔·科列斯尼科夫 亚历山大·奥别古诺夫

① 这两个苏联使馆官员由于从事颠覆活动而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另外有二十三名苏联官员也被要求离开这个国家。这些官员的九十四名家属也在1972年4月离开这个国家，使苏联官员和家属“减少的人数”总计一百一十九人。

年 月	国 家	姓 名
1961 年 1 月	乌拉圭	米哈尔·萨莫伊洛夫
1959 年 4 月	阿根廷	尼古拉·贝洛乌斯 德米特里·吉阿科诺夫 瓦西里耶·伊瓦什奥夫 康斯坦丁·蒙纳霍夫
1959 年 4 月	墨西哥	尼古拉·阿克肖诺夫 尼古拉·列米佐夫
1956 年 6 月	阿根廷	亚历山大·莫罗佐夫
1952 年 6 月	委内瑞拉	米哈尔·阿尔耶比涅夫 列夫·克雷洛夫

材料来源，《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迈阿密先驱报》，拉丁美洲报纸以及官方材料。

莫斯科的古巴基地

六十年代初期，莫斯科在加勒比地区的主要间谍中心设在古巴。近四百名苏联情报官员被派到古巴来训练和支持全西半球的革命组织。^① 古巴的情报机构（情报总局）于1961年年中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它保持自己的独立，直到1967年受苏联直接控制时为止。古巴情报总局现在只是资助那些得到莫斯科同意的革命组织的训练、军火采购和其它活动。

^① 《纽约时报》，1970年12月7日。

在六十年代期间，古巴情报总局分成中美和南美两片，分别负责在它的地理区域内指挥革命和情报活动。在情报总局成立以来，估计有二千五百名拉丁美洲人（和一些北美人）在古巴设立的中心站接受过颠覆活动和革命暴乱的训练。在古巴的一些特别学校里讲授过游击战和城市恐怖战术，初出茅庐的革命者在那里接受使用武器、制造炸药、军事战术，战地工程、爆破术和进行破坏等方面的知识。

在1970年4月到5月劳尔·卡斯特罗访问苏联期间，苏联官员要求改组和扩大情报总局，以便使更多的情报总局的官员能够被派往海外来代替各驻外使馆的外交部人员。^①莫斯科提出论据说，古巴政府在国外的主要使命是搜集情报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情报总局，而不是外交部的职责。尽管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强烈抵制，苏联的建议在劳尔·卡斯特罗回到古巴之后就付诸实行了。

1970年12月，古巴的外交官开始由情报总局的官员取代，整个1971年继续着这一过程。有几位古巴大使由于他们被情报总局所揭发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弱点而被免职。在哈瓦那，情报总局局长曼努埃尔·皮涅罗·洛萨达则由劳尔·卡斯特罗所提名的亲苏分子何塞·门德斯·科明塞斯所代替，情报总局的其他反苏官员也被免职。古巴情报机构的基本政策方针现在由苏共中央委员会确定。一名苏联克格勃的官员监督着莫斯科指令在情报总局的执行情况，检查情报总局直到组一级的全部年度行动计划，并审查涉及安插重要特务的

^① 布赖恩·克罗泽，《苏联在加勒比地区施加的压力》，载《冲突研究报告》第35期，伦敦冲突研究协会，1973年，第14页。

敏感的行动。^①

古巴情报官员清楚地了解，克格勃已经渗入古巴的情报总局，并从俄国人每年训练的六十名古巴官员中积极物色特务。这必然会增加苏联对古巴情报机构的控制的可靠性。从1964年以来，总数约有五百五十名古巴情报官员在设在莫斯科和莫斯科附近的两所苏联情报学校受过每期十个月的训练。^②

古巴在国外的情报活动同苏联克格勃的活动配合得这样紧密，以致古巴情报总局有效地成为苏联情报机构的一个帮手。这符合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图谋，在那里，情报和颠覆活动可以由古巴人来干而不致暴露莫斯科的插手。例如，在阿连德政府时期，莫斯科悄悄地掌握了以古巴在圣地亚哥的大使馆为基地的人数众多的情报总局人员所搜集到的全部情报。

莫斯科在墨西哥的基地

从五十年代初期起，墨西哥城就已经成为苏联在美国和加勒比地区(包括中美和南美北部)搜集情报活动的主要支援基地。1970年年底，苏联在墨西哥城的大使馆估计有人员一百二十名。^③这一数目包括了苏联外交官的妻子们，她们通常担任大使馆的秘书、簿记员、报务员、帮厨，有时充当克格勃

① 布赖恩·克罗泽，《苏联在加勒比地区施加的压力》，载《冲突研究报告》第35期，伦敦冲突研究协会，1973年，第16页。

② 同上。

③ 《纽约时报》，1970年12月7日。

的特务。^① 苏墨官方关系的规模有限，显然不需要有这么多的人员，在墨西哥城至少有四十名苏联男外交官被认为是搞情报的官员。一直到最近，莫斯科小心地避免从事直接触犯墨西哥政府的活动，而墨西哥政府则感到，容忍留驻人数众多的苏联人在政治上是一种权宜之计。

驻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在整个加勒比地区从事范围很广的颠覆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对当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提供基金和指导；散发反美宣传品和印刷品；物色左派、学生和移居国外的俄国人为苏联搞情报；选拔学生并发给他们奖学金去苏联和苏联集团的国家旅行和在莫斯科的卢蒙巴大学学习；同当地左派和马克思革命组织保持联系；从事间谍和搜集情报活动；设法影响重要的大学生和工会领导人；充作苏联特务来往于加勒比地区 and 美国的转运站。

墨西哥尽管容忍苏联的颠覆活动，也没有逃脱掉莫斯科在政治上的干涉。1971年8月21日，五名伪装成苏联外交官的克格勃官员被墨西哥政府驱逐出境，因为他们资助和组织了一个革命运动，名为革命行动运动。这个运动是在1968年由法夫里西奥·戈麦斯·索萨组织起来的，他是1963年在墨西哥城被克格勃收买的一个特务。^② 装成苏联在墨西哥城的文化参赞的克格勃官员鲍里斯·N·沃斯科鲍伊尼科夫于1968—1970年期间挑选了一些墨西哥学生到莫斯科的卢蒙巴大

^① 诸如奥列格·涅奇波伦科的老婆利季亚·涅奇波伦科，她在1971年3月被墨西哥政府驱逐出境。她由克格勃指派在苏联大使馆担任全时工作。参见巴伦前述著作，第233页。

^② 详见约翰·巴伦，《克格勃》，纽约：读者文摘出版社，1974年，第230-252页。

学受训，其目的是要使他们在结束受训返回墨西哥后成为进行亲苏活动的核心力量。克格勃还安排了一批在莫斯科受过训的和其他墨西哥学生在北朝鲜接受游击战训练，以免人们看出苏联的插手。初出茅庐的游击队员回到墨西哥，加入革命行动运动。他们被墨西哥政府逮捕，罪名是：“阴谋和煽动叛乱，合伙犯罪，武装抢劫，杀人，非法拥有武器，伪造证件，使用伪造官方文件。”^① 被俘的游击队员供认，他们曾于1969和1970年在平壤附近的一个北朝鲜军事基地接受过破坏、恐怖行为、抢劫和游击战术的训练。由于克格勃直接插手组织革命行动运动，墨西哥政府驱逐了五名苏联外交官，借以强调它认为莫斯科支持墨西哥游击队的严重性。

这不是克格勃第一次在墨西哥插手颠覆活动。在鲍里斯·沃斯科鲍伊尼科夫被驱逐出境的前几年，他就负责指挥过一些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举行反对墨西哥政府的示威。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和其他克格勃官员组织并资助一批有纪律的共产党学生和青年，他们就是在1968年10月2日，也就是1968年奥运会开幕前夕挑起政府部队同六千名青年之间的悲剧性对抗的“突击队”的部分成员。大约二十八人（二十六名平民和两名士兵）死于示威学生和军队接着发生的搏斗中。

在一个国家同苏联建立关系之后，共产党的宣传、政治鼓动和间谍活动通常总有明显的增加。例如，在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劳工煽动和思想灌输活动、^② 新闻渗透^③ 以及宣传品的

① 墨西哥城检察总署1971年3月16日的声明。

② 马德坐埃非通讯社1972年9月21日电。

③ 波哥大《世纪报》，1972年9月14日。

散发，^①在1972年有了急剧的增加。苏联外交官被指控对当地共产党人提供金钱和其他帮助。1972年8月，哥伦比亚外交部长驱逐苏联驻波哥大大使馆的三名官员出境，其原因是“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②还有证据表明，七十年代初期，克格勃利用苏联新闻社和塔斯社作为掩护，加强了苏联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间谍活动。^③

1971年7月，厄瓜多尔赶走了三名俄国官员，因为他们在国内的劳工问题上插了一手。^④这三人——政治事务官员阿纳托利·M·沙达林、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罗别斯比埃尔·菲拉托夫和瓦伦了·A·戈罗金——可靠地说是克格勃的特务，他们向马克思主义分子控制的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提供了款项。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利用这笔款项来举行总罢工，而这次罢工据说是为了配合亲莫斯科的军人策划的一次军事政变。在这一事件中，厄瓜多尔政府并没有同苏联断交。同样的事件于1971年在乌拉圭发生过，于1973年在哥伦比亚发生过。在乌拉圭，虽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城市恐怖组织图帕马罗斯得到外来的资助或指示，但是，图帕马罗斯、当地的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同苏联和古巴官员的关系密切得令人生疑。1971年6月，豪尔赫·帕切科·阿雷科总统警告苏联可能要断绝外交关系。1973年，哥伦比亚政府在截获苏联向哥伦比亚游击队提供的款项后认真地考虑过同苏联断交的

① 波哥大《世纪报》，1972年9月14日。

② 合众国际社波哥大1972年8月5日电。

③ 加拉加斯《世界报》，1971年2月20日。

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1年7月10日。

问题。^①

苏联搞非法和反政府活动的这些最近事例在拉丁美洲引起了抗议风暴。但是，尽管同苏联保持外交关系这件事本身就带有潜在的破坏性，大多数国家仍然认为可以期望得到的政治上和经济上好处使它们值得冒这个风险。此外，拉丁美洲的反美民族主义继续把同苏联建立关系当作一种向美国挑战的行动。

另一方面，不应对有所增加的苏联宣传和情报活动所包含的颠覆危险加以夸大，虽然这种危险是很实在的。例如，以墨西哥为基地的苏联搜集情报的力量至少有一半是针对美国的。而且，莫斯科对恐怖和游击运动所给予的秘密援助是有选择的，它尽量不去损害自己作为一个“正常”和“实事求是”的外交伙伴的形象。苏联领导人是实用主义者，在革命暴力和颠覆活动没有多大成功希望的地方，他们强调要保持“正确”或不干涉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为了从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得到好处，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在操纵和影响“体面的”政治人物和团体上。

^① 合众国际社波哥大 1973 年 9 月 30 日电，哥伦比亚警察，经墨西哥当局提请注意，于 1968 年 4 月从两个共产党信使身上查获十万美元。这两个信使 在墨西哥城从克格勃官员尼古拉·谢尔吉维奇那里收到这笔钱。参见前述巴伦著，《克格勃》，第 256 页。

第五章 莫斯科支持革命的暴力

同广泛传播的印象相反，莫斯科同在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发起恐怖活动或游击战是有瓜葛的。^①向许多革命组织提供武器、金钱和训练，这是莫斯科扩大其影响、从而最终在第三世界建立保护国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那些需要建立莫斯科革命信誉的地方，特别在受到北京和极左派组织挑战时，革命的暴力也得到它的支持。

苏联的秘密活动

莫斯科对游击战或城市恐怖活动的公开支持通常是加以回避的，这是为了保持它精心树立的使人放心的规矩形象。苏联对革命组织的援助的秘密性质——在拉丁美洲，这种援助主要是采取支持古巴革命冒险的那种方式——使得人们不可能抓住确凿的证据。但是由于最近包括奥兰多·卡斯特罗·依达尔戈和赫拉尔多·佩拉萨在内的古巴情报机构的变节者泄露了情况，^②人们对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活动的了解比

^① 弗赖恩·克罗泽：《苏联卷入暴力活动》，载《苏联问题分析家》，第1卷，第11期，1972年7月20日，第4页。

^② 奥兰多·卡斯特罗·依达尔戈：《菲德尔的间谍》，迈阿密，西曼出版社，1971年版。

奥兰多·卡斯特罗·伊达尔戈在1969年4月变节时担任古巴情报总局驻巴黎的官员。赫拉尔多·佩拉萨曾是派往古巴驻伦敦大使馆的情报总局官员，1971年9月叛变并逃离英国，11月在美国要求避难。

对它在别的地方的活动的了解还是要多一些。

古巴和苏联的不同的革命利益是这两个政权在整个六十年代对立的原因。莫斯科和正统的共产党在六十年代初期有节制地赞同古巴的武装斗争战略。苏联甚至支持一些由古巴支持的游击队组织，以便在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领导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到六十年代中期，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前景变得暗淡了，而公开同游击运动发生关系的做法被认为是自找失败和违背当时苏联的利益而被摒弃。美国在1965年多米尼加起义期间的军事干涉表明，华盛顿阻止共产党进一步侵入加勒比地区的决心是坚强的和富有成效的。其结果是，莫斯科同本大陆的革命逐步脱离接触，并恢复到采取一种更加有节制和谨慎的战略。自此以后，苏联迅速采取同拉丁美洲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行动，作为扩大它的影响的最有效和可行的手段。由于古巴和苏联在革命的观点和策略上存在分歧，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

但是，到七十年代初期，苏联为控制古巴对外政策而作的努力获得了很大成功。虽然莫斯科不能象在东欧那样，操纵古巴共产党的机构或以军事干涉相威胁，古巴在经济上对苏联贸易和援助的深度经济依赖还是给了俄国人相当大的权力，他们利用这种权力来对付卡斯特罗，并且明显地取得了效果。莫斯科以切断一切经济援助和战略商品的进口相威胁，要卡斯特罗克制而不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不试图败坏追随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的威信和不在未同莫斯科事先商量的情况下在某些国家发起游击队行动。确实，他们要卡斯特罗签

署一项约束他支持苏联路线的秘密协定。^①最近古巴情报机构的变节者赫拉尔多·佩拉萨在1971年9月指出,1970年苏联驻哈瓦那的克格勃人员曾经迫使劳尔·卡斯特罗清洗古巴情报总局中的所有反苏军官。^②

而俄国人方面则报以同意资助古巴情报总局的那些经他们同意的活动,如在智利训练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玻利维亚的官员们说,在智利重新组织了民族解放军,为的是推翻玻利维亚政权,而对这件事阿连德政府是知情并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的。^③据佩拉萨说,古巴情报总局获准在智利搞训练活动,是因为阿连德胸有成竹地准备让古巴人利用他们新建的驻圣地亚哥使馆作为他们在西半球的主要谍报和革命中心。^④阿连德当选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随即把一些谍报特务派往圣地亚哥。1970年年底,两名高级军官胡安·卡雷特罗·依班卡和路易斯·费尔南德斯·奥纳就常驻智利首都。他们领导着由六名古巴军官组成的小组,其首要任务就是改组阿连德的私人卫队和智利保安局。^⑤

古巴还向智利的马克思主义准军事组织提供军事装备和

① 参阅奥兰多·卡斯特罗·伊达尔戈的证词。《美国第九十一届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上的作证》第20部分,1969年10月16日,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0年,第1425—1426页。

② 参阅布赖恩·克罗泽,《苏联卷入暴力活动》,载《苏联问题分析家》,第1卷,第11期,1972年7月20日。

③ 参阅法新社拉巴斯1972年6月20日电。

④ 参阅布赖恩·克罗泽,《苏联卷入暴力活动》,载《苏联问题分析家》,第1卷,第11期,1972年1月20日。

⑤ 参阅《每日电讯报》,1973年9月16日。

训练。这些组织由于来自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古巴、墨西哥、秘鲁和其它国家的革命者小分队的加入而得到加强。这些外国人来到智利后不久就得到了假身份证，其中许多人被安插到国营企业和政府部门中去。古巴官员同智利的极左派和流亡的革命团体保持密切的接触，并试图建立一个以智利为基地的新的拉美反帝阵线。^①

为了抵销苏联对古巴情报机构（古巴情报总局）的影响，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70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民族解放局，起用从古巴情报总局遣散的反苏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曼努埃尔·皮内罗·洛萨达（前情报总局头目），他被任命为民族解放局局长。民族解放局策划了在拉丁美洲展开的莫斯科不同意的各种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智利采取的行动。由于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卡斯特罗受到了一次重大挫折。智利军政委员会立即驱逐了一百五十名古巴官员及其眷属，拆除了游击队训练营和谍报中心，并断绝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卡斯特罗在为支撑阿连德总统的士气和在武装对抗中提供古巴的援助所作的一次毫无希望的尝试中，甚至派遣曼努埃尔·皮内罗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副总理）在1973年8月，即军事政变前一个月前往圣地亚哥，^②但是毫无结果。

最近几年来古巴经济的严重恶化使筹集能够用于卡斯特的革命冒险事业的资金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古巴转而向

^① 参阅合众国际社华盛顿1971年12月20日电。

^② 参阅菲德尔·卡斯特罗1973年7月29日致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信，此信发表在《智利政府换文白皮书》，1973年，圣地亚哥，第101—102页。

北朝鲜要求财政和军事援助。^① 1970 年底，智利和北朝鲜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然后，北朝鲜在 1971 年 5 月在圣地亚哥开设了商务代表处；于是，从 1970 年起设在古巴的一个北朝鲜游击队训练团转移到了智利。北朝鲜人同意训练智利社会党（执政的人民联盟的一部分）的准军事部队，这支准军事部队不同于左派革命运动（M I R）的人数更加众多的队伍。^② 无论是左派革命运动还是社会党的极端分子都致力于开创一种不可扭转的革命形势，于是造成同保安部队的对抗。在 1973 年全年，社会党的突击队大规模使用暴力，恫吓民主派反对党，^③ 这是引起军事政变的主要因素之一。

古巴人和北朝鲜人搞革命暴力活动的手段是不同的。在智利，古巴人喜欢搞爆炸和暗杀，而避免同国家保安部队直接交手。北朝鲜人建议采取更富有进攻性的策略，诸如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以刺激武装部队采取不成熟的行动。俄国人则反对不由他们控制的智利极左派发起的极富挑衅性的革命暴力活动，并且一般说来避免公开卷入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他们玩弄了两面手法。他们支持谨小慎微、纪律严明的亲莫斯科的智利共产党（也是执政的人民联盟的一部分），这个党主张逐步夺取政权，反对左派革命运动暴力夺取农庄和工厂，也反对社会党极端分子的非法行动。同时，莫斯科并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古巴情报总局训练左派革命运动的游击队。

① 参阅布赖恩·克罗泽：《苏联卷入暴力活动》，载《苏联问题分析家》，第 1 卷，第 11 期，1972 年 7 月 20 日。

② 同上。

③ 合众国际社圣地亚哥 1973 年 2 月 1 日电。

俄国人还利用古巴向智利渗入大量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供极左派使用,甚至指派苏联军官去训练工人革命者中的中坚分子掌握城市游击战术。^①莫斯科一方面正式批评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却明显地希望通过有选择地支持革命来保持它在极左派中的一些影响。

一般说来,莫斯科只资助古巴情报总局在当地革命团体能够被说服接受统一战线策略和当地亲苏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地方开展的活动。在那些所谓的解放运动同正统的共产党相冲突的地方,作为实用主义者的俄国人宁愿看到他们置于古巴的控制之下,而不愿冒使他们落入中国控制的风险。苏联官员通常避免公开卷入支持革命活动。苏联常常通过古巴和东欧国家提供金钱来资助革命的暴力活动,这些国家的间谍组织完全控制在苏联手里。^②

古巴支持起义

古巴仍然是向拉丁美洲输出革命的主要基地,虽然同六十年代相比,规模要小得多。国外武装斗争的失败、国内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乱以及苏联在哈瓦那的日益加强的影响,迫使卡斯特罗修补他同克里姆林宫关系中的漏洞。在带有明显的勉强和巨大保留的情况下,卡斯特罗接受了莫斯科现行的和平共处路线和它所强调的向社会主义渐进的道路。目前,

① 参阅《华盛顿明星新闻报》,1974年1月14日。

② 参阅约翰·巴伦,《克格勃》,纽约,读者文摘出版社,1974年。

卡斯特罗的对外政策紧密地同苏联的对外政策联结在一起，并且，他正在表现为更多地关心打破外交上的孤立、恢复同邻国的经济关系和加强它在西半球事务中的外交影响。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遭到拉丁美洲极左派势力的猛烈攻击。这种情况引起了对卡斯特罗的革命声誉的怀疑，并且表明了卡斯特罗言过其实地自命为拉丁美洲革命“最高领袖”的作法的空虚。

然而，卡斯特罗并没有完全放弃他向拉丁美洲输出古巴式武装革命的努力，古巴在阿连德执政时期在智利支持革命暴力活动的作法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墨西哥、波多黎各和西印度群岛的由卡斯特罗鼓动起来的游击队或恐怖主义分子继续从古巴得到一些零星的支持——金钱、武器、宣传材料，特别是训练。古巴教官仍在设在古巴的六个营地对拉丁美洲游击队进行城市和农村起义的训练。^① 尽管卡斯特罗作出了最大的革命努力，但是，除了智利可能是一个例外，在西半球没有一个政府受到古巴支持的游击队的严重威胁。今天，武装的革命者不过是恼人的，而在任何地方都不构成对安全的主要威胁。许多政府认为，土生土长的恐怖主义组织——其中有一些同古巴保持接触——更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惨败以及他在1967年10月的死亡，生动地标志着拉丁美洲农村游击运动的垮台。这次惨

^① 参阅国务院官员证词，《美国第九十二届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作证》，1971年9月16日，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第9页。

败不过是1965年以来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游击队遭到的一系列失败中的一次。在上述国家里，农村起义运动是孤立的，一般说来没有什么成效。“客观条件”（农民自愿提供支持、存在不得人心的政府等）显然还没有成熟到能够使下定决心的领导人去成功地加以利用的程度。此外，游击队几乎都是一样地无能，并由于不可克服的语言、阶级和文化上的障碍而脱离当地居民；他们从陷入困境的古巴国库得到的资助极少；他们从传统的共产党和城市中心陷于分裂的左翼组织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他们还面对着美国为反暴乱而训练和装备得越来越精良的军队。

城市游击队

不管出于哪种原因，以农村为基地的起义的失败都导致重点转为城市恐怖主义。尽管卡斯特罗把城市称作“革命者的坟墓”，从1967到1968年间，拉丁美洲城市中心的革命暴力活动依然不断增加。当然，转向城市恐怖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农村的游击队活动。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甚至墨西哥，农村游击活动虽然规模变小，但依然活跃。看来，格瓦拉死后把新的重点放在城市游击战上，这是一种为使当地政府处于守势而制定的策略。游击队的领导人仍然认为，革命的命运最终将取决于农村。但是，与此同时，通过城市暴力的间接途径可以获得开初的成功和成为一种起动力。

从某种意义来说，游击队在城市里的活动条件要比在农村有利。干部主要来自城市知识分子、大学生和自由职业者，

他们在城市里如鱼得水，行动自如，他们与其他城市居民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在教会的激进分子，如“第三世界”运动中，在极左派政党和劳工运动的极端派中得到支持。

在拉丁美洲，城市恐怖主义分子最活跃的地方是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其次是中美洲、西印度群岛讲西班牙语的地区和墨西哥。古巴向卡斯特罗支持的波多黎各“独立运动分子”提供外交和宣传上的支持以及一些训练。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加勒比英语地区的民族主义组织“黑人权力运动”——他们同古巴革命的许多民族主义目标是一致的——得到古巴或苏联的支持。

总的说来，城市游击队除了标准的左派口号和主张外，缺乏思想上或纲领上的凝聚力量。但是，他们的破坏性和危险性并不因为他们缺乏对共同事业的专心致志的献身精神而变得小一些。城市恐怖主义分子的基本目标是：在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制造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使政府处于守势和显得无能为力；通过迫使政府诉诸结果适得其反的镇压来孤立它；通过采取一些触目的行动（如占领村庄、绑架外国的外交人员、抢劫银行等）来引起公众的注意；以及总的来说去提高他们的革命形象。他们试图在那些存在选举进程的地方破坏这一进程，分化政治力量，为最终推翻现政权的内战创造条件。

拉丁美洲的城市游击队只从古巴获得一些零星的物质支持，他们主要靠抢劫或向被绑架者索取赎金来获得款项、武器和其它装备。同那些比他们先行的农村起义者一样，他们也没有能够动员人民的广泛支持。他们的手段太强暴，他们的

目标太模糊。城市恐怖主义分子轰动一时的成功，与其说反映游击队的力量，还不如说反映了城市治安方面普遍存在的困难。

革 命 的 前 景

即使大部分加勒比和南美国家的农村和以城市为基地的起义运动立即获得成功的前景暗淡，但是这种情况在七十年代可能发生变化。苏联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在拉丁美洲越来越多的出现，有助于在整个政治——心理环境上产生细微、但是渐进的变化，而在这样的环境下，革命在发展。过去，美国的近在咫尺和无敌的力量使得共产主义革命者把一旦取得的成功（即推翻现政府和取得政权）保持下去的希望变得暗淡。但是，在将来，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的出现很可能改变这种力量悬殊的局面。

拉丁美洲左派的分裂是多次的失败、尤其是委内瑞拉和危地马拉长期游击队运动的失败的结果。委内瑞拉和危地马拉的游击队运动遭到失败，是因为起义者没有能够得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农民的合作。在未来的运动中，他们的运气也许会好些。在本地区，不是所有的政府都能象在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那样，有把握能够指望农民的广泛支持来对付极端主义的游击队。即使在墨西哥，也不是在全国所有地方都能可靠地得到支持。

此外，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和左派政治家们显然是坚韧不拔和具有活力的。由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和苏联的“保护性”

存在激发起来的获得成功的新希望将足以促使他们克服宗派主义的分歧并建立一个成功的统一战线,犹如他们1970年在智利大选中所做到的那样。但是,如果以为亲苏的共产党——加上他们在莫斯科的师傅——目前只致力于通过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那就错了。在东西方关系受挫,或者在革命暴力的前景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迅速转为更积极地支持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六章 同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关系

莫斯科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发生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俄国革命。在斯大林主义时代，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组织坚如磐石，内部纪律严明，并且坚定不移地忠于莫斯科。但是，即使在斯大林逝世以前，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已经开始分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世界共产主义危机深刻地瓦解了西半球的共产主义运动。古巴革命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左派的进一步分裂，从此持不同见解的共产主义派别纷纷成立，从正统党的手中争夺革命领导权。

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共产主义派别虽然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却常常对当地的共产党和对莫斯科持敌对态度。他们指责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不是真正革命的党，而这种指责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缺少朝气蓬勃的革命传统。在这个困于内乱和起义的大陆上，共产党人的活动状况却一直是格外地沉寂。1935年路易斯·普列斯特斯领导的反对巴西政府的叛乱，以及1932年在萨尔瓦多的那次可能也是由共产党鼓动起来的起义，是共产党人以武力攫取政权的仅有的重大尝试，虽然共产党也曾参加了一些由非共产党集团组织的起义。

缺少革命的热情并不意味着拉丁美洲的共产党讲民主。

他们是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实行极权主义的极权主义政党。他们不信奉西半球民主国家中所享有的民主多元论和民权。一旦实权在握，如1946—1947年以及1970—1973年在智利，1954年在危地马拉，从1960年迄今在古巴，他们的极权主义的性质立即在他们对待盟友和对手两方面的态度上显露出来。^①

拉丁美洲共产主义的力量

目前，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成四种主要政党或派别：正统的亲莫斯科派；亲卡斯特罗派；亲北京派；以及拒绝对莫斯科、北京或者哈瓦那亦步亦趋的独立派。

在二十个拉丁美洲共和国、四个加勒比英语国家以及法国的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省中，1973年估计有共产党员四十万人。共产党的同情者或同路人为数更多——可能是党员数的两倍或三倍。最大的共产党是古巴（十二万五千人）、智利（十二万人）^②、阿根廷（七万人）、乌拉圭（二万二千人）、墨西哥（一万五千人）、哥伦比亚（一万一千人）、委内瑞拉（八千人）和巴西（七千人）等国的党。对共产主义力量进行估计时，还必须把每个国家的为数众多的重要性不等的外围组织计算进去。

^① 参阅恩斯特·哈尔伯林，《拉丁美洲》，载《调查》第54期，1965年1月，154—155页。

^② 智利共产党党员人数是1973年9月11日军事政变前的数字，这次政变推翻了阿连德的马克思主义政府，逮捕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并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表六 1973年^①拉丁美洲共产党党员人数

亲莫斯科派	263,085
亲北京派	3,810
亲卡斯特罗派	1,000 ^②
独立派	10,675 ^③
古巴的非德尔主义党	125,000
态度不明的	850
总 数	404,420

资料来源：《世界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华盛顿：美国国务院，1973年）；以及布赖恩·克罗泽编，《权力和冲突的年度报告，1971年》（伦敦：冲突研究所，1972年）。

除了古巴，从党员人数和影响方面说最强有力的共产党是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的党。在1973年9月的军事政变以前，智利有南美洲最强、组织得最好的共产党和一个思想体系上不稳定的、但几乎是同样强大的社会党。智利的共产党人坚定地忠于莫斯科；他们的领导人路易斯·科尔巴兰多年来最直言不讳地维护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利益。由于1973年9月发生了军事政变，阿连德政权被推翻，智利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包括路易斯·科尔巴兰本人）被关押，党被宣布为非法，该党（以及参加人民团结联盟的其他党）遭到了严重挫折。在讲西班牙语的中美洲和岛屿共和国，那里的一些小而分裂的党一般来说是软弱的和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在加勒比英语地区，共产党的人数和影响（除了圭亚那的党以外^④）都微

① 统计数字包括四个加勒比英语国家，加上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

② 许多非德尔主义党派的实际力量不详，这个估计数字也许是保守的。

③ 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独处的持不同意见的小组。

④ 圭亚那人民进步党（PPF）的领导人契迪·贾根是奉行莫斯科路线的共产主义者；但是这个印度族人的党的基层党员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几乎没有兴趣。

不足道。

在整个中南美洲，只有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圭亚那、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以及法属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的共产党有合法地位。然而，不论是非法的或者是合法的，共产党和他们的外围组织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并且渗进诸如有组织的劳工、大学生和上层知识界等关键性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对军政界的渗透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在某些国家，共产党力量弱小或者处于非法地位，即使如此，他们也是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一个因素。共产党掌握的几千张选票可能左右一次选举；它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可以有助于发动或者平息一次暴乱；它与工会的联系也许有利于军事独裁者争取改善自己的形象以及取得平民的拥护。这些共产党所采取的异乎寻常的机会主义和灵活态度使得别人有可能以适当的代价来换取他们的效劳；在政府控制的工会官僚机构中提供一些职位，对被押同志们实行赦免，或者允许出版一张日报或者一份期刊。^①这恰恰一直是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弱点，它使得政客们可以和他們进行合作而不招致灾难。当这些共产党盟友不再有什么用处时，政客们发现想甩开他们，那也是毫无困难的。

正统的亲苏派

目前，在拉丁美洲二十四个拉丁美洲国家和讲英语的共

^① 参阅恩斯特·哈尔柏林：《拉丁美洲》，载《调查》第54期，1965年1月。

和国中的二十个国家存在着听命于莫斯科的党：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这些亲莫斯科的党依靠苏联的支持和指导，并且经常在损害它们自己国家的情况下不断地为增进苏联外交政策的利益而出力。同外国势力保持这种亲密的力求一致的关系是一大障碍，限制了当地共产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苏联在物资、精神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这些一般说来是软弱的、内部派别成灾的党很可能无法生存下去。

这些正统党的大部分中上层领导人是在苏联和东欧接受训练和思想灌输的。他们曾被教导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维护和促进莫斯科的利益并且对苏联的各种政策自始至终保持奴才般的忠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时期中，他们曾经十分努力地散发苏联的宣传品，安排人去访问苏联和东欧，建立“友好”组织以在他们的国家宣传苏联。^①半个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共产党领导人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为苏联的利益服务。^②

正统派的党拒绝以武装革命的道路夺取政权，而奉行更为谨慎、灵活和基本上是由莫斯科制订的避免战斗的路线。革命的党和遵循莫斯科路线的党在战略和学说上的分歧，在

^① 罗伯特·亚历山大：《中苏分裂对拉丁美洲共产主义的影响》，载唐纳德·赫尔曼编著：《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潮流》，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② 同上。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年龄、训练、思想灌输以及和苏联的联系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一般说来，亲莫斯科的领导是来自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他们行将进入中年或者是中年以上的人了，不言而喻，他们对在农村地区或者在城市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缺乏热情。再说，他们不愿意危害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劳工运动、全国和地方政府以及政治界和知识界中已经取得的不同程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菲德尔主义派和亲北京派

古巴的菲德尔主义党是这个地区的最大的党，并且是拉丁美洲在执行路线方面多少独立于莫斯科或者北京的少数共产党之一，虽然从1968年以来，卡斯特罗在大部分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已经转向更加亲苏的立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弱小的、派系成灾的菲德尔主义党也接受哈瓦那的领导。此外，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的一大批激进的非共产主义政党中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影响。略举数例，一些智利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本人是卡斯特罗的亲密朋友）、智利左派革命运动、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阿根廷的人民革命军（ERP）和玻利维亚的民族解放军（ELN）都是强烈地亲卡斯特罗的。但是卡斯特罗看来并没有作认真的努力去建立一个受其严格控制的组织以便同莫斯科和北京竞争，虽然他的确在建立一个作为革命协调机构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OLAS）中带了头。

拉丁美洲的亲北京的共产党是由正统的亲莫斯科党内的

一些自行其是的高级人士所组成的，他们在什么是取得政权的最有效的策略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这些人士对奉行老路线的党所主张的通过谨慎、和平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做法感到灰心，而被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可为早日取得政权开辟前景的更加富于战斗性的战略所吸引。他们欢迎毛主义的“人民战争”的教义，而且试图利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裂痕^①，为此，他们从正统党中分裂出来，并且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新的亲北京的党从基层得到的支持多来自“亲莫斯科党的年青党员和青年组织，因为他们对执行老路线的领导的没有战斗性的保守主义同样感到失望。”^②

到六十年代末，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波多黎各都有亲北京的党。象菲德尔主义党一样，亲北京派构成了拉丁美洲极左派的小而无足轻重的一个部分。他们缺乏其亲莫斯科对手们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和严密性。

苏联对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支持

在这个出现缓和的时代，苏联并没有放弃它在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它地区争夺权力和影响的角逐。莫斯科继续使用包括忠诚的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和手段，在非共产主义世界到处制造革命形势。鉴于东西方缓和以及超

^① 罗伯特·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共产党》，载唐纳德·赫尔曼编著：《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潮流》，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② 同上。

级大国和解的趋势在日益加强，需要强化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①

在七十年代初，莫斯科把拉丁美洲当作“革命潜力”最大的第三世界地区。他们认为那里的革命运动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更有希望的阶段，已为执行莫斯科路线的党执政或参政提供了新的机会。形成这一有利情势的主要原因是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共产党—社会党联合政府的当选。“人民团结联盟”的胜利被说成是一桩具有“巨大的普遍的理论价值”的事件。它确证了苏联的下列一些论述：关于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左派力量联合阵线的极端重要性，共产党人的逐渐接管政府，以及作为反对国内外反革命活动的保护伞的苏联支持的重要性。鉴于阿连德政府被智利武装部队以暴力推翻，上述乐观的估量无疑地将要被修正。

苏联势力在这个地区的扩张能使共产主义运动的日见其少的机缘增加到什么程度，或者能使这个已经失去光辉的代表“未来的潮流”的共产主义形象增色到什么程度，是值得研究的。苏联对古巴的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显示：即使在加勒比地区，一个敌视美国的共产党政权也可以生存下来。但是古巴的受庇护的地位及其对苏联的几乎完全的依赖，古巴“社会主义”实验在经济方面的凄凉状况以及它在国外煽动武装斗争方面遭到的失败，已经明显地削弱了菲德尔主义对共产

^① 参阅鲍里斯·波诺马廖夫：《世界革命政权的理论中的问题》，载《共产党人》，莫斯科，第十五期，1971年10月。波诺马廖夫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从1955年以来，一直负责处理苏联共产党和非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波诺马廖夫的文章是代表苏联领导层观点的有权威性的声明。

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左派的吸引力。

这些互相角逐的共产党在拉丁美洲取得政权或者参加政权的前景一般说来是不妙的，在阿连德政权于 1973 年 9 月垮台以后也许就更不妙了。亲莫斯科和独立的党的最大希望从长远来说仍然在于同更得人心的左派民族主义集团和政府结成联盟。左派军政府或者民粹派的文人政府的出现也许为共产党人特别是亲莫斯科的共产党提供了新的机会。另一方面，民粹主义的军人和文人政权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很可能减少共产主义的吸引力，特别是它对中产阶级的学生、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吸引力，从而使莫斯科路线的党在争取决定性的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他们不仅不再垄断激进的纲领，而且还必须而对这样的事实——他们的不耐烦的极左派对手主张更为迅速和彻底的变革。

第七章 同古巴的关系：冲突与和解

莫斯科和哈瓦那的插手拉丁美洲革命进程，是以时而互相竞争、时而互相合作为特点的，这是由于两国有不同的民族利益，对拉丁美洲的革命前景有不同的理解以及两国有各自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两国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削弱美国的地位；传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加强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在古巴建立共产主义。

在卡斯特罗攫取政权后，古巴组织的游击队立即入侵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尼加拉瓜和巴拿马。所有这些远征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在卡斯特罗早期从事的任何罗曼蒂克的革命冒险行为中，都没有苏联卷入的证据。然而，莫斯科确实同意帮助菲德尔·卡斯特罗组织一个有效率的情报机构，其中包括在情报、颠覆和游击活动等方面的训练工作。1961年年中，苏联已为从事海外秘密行动组织了情报总局，到那一年末，卡斯特罗的特务已在对拉丁美洲各国进行渗透了。

尽管卡斯特罗在古巴取得不寻常的成功，莫斯科对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前景仍持怀疑态度。苏联领导对向卡斯特罗提供支持也是谨慎的，在他们看来，他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加勒比头头和革命冒险分子。他们害怕卡斯特罗会使苏联卷入不明智的革命冒险行动的纠纷中去，或者会使苏联在美国

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这个地区卷入同美国的危险的对抗。但是，莫斯科不久就开始看到，帮助卡斯特罗更为有效地组织间谍活动和国外的革命活动是有某些好处的。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

1962年2月2日，古巴的情报总局建立以后不久，卡斯特罗发出了新的号召（所谓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并且保证古巴支持这个大陆的“解放”。接着是五年的连续不断的革命活动。哈瓦那为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武器、训练、款项，有时还加以领导。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在古巴和苏联之间反复出现了紧张关系。苏联领导层对卡斯特罗输出革命的能力是抱怀疑的，力称必须由每个国家自己来决定正确的道路——和平的或者非和平的。另一方面，卡斯特罗却相信革命的暴力能够创造革命的条件。他对以长期的、和平的道路去取得政权是感到不耐烦的。在第二个哈瓦那宣言中，卡斯特罗拒绝提及“和平共处”或苏联赞成的其它意识形态的信条，而宣称游击战争是解除第三世界的灾难的唯一方法。

暴力革命的两位提倡者，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对于人们对他们的武装起义号召的微弱反应显然感到失望。1963年1月，卡斯特罗对拉丁美洲革命者的胆怯以及对拉丁美洲的主张非暴力的正统共产党拒绝采纳他的方针发了一通怨气。苏联领导人在私下反对他的纲领，理由是这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这反映了最恶名昭彰的一种左倾冒险主义，面

最糟糕的是它确实非失败不可。在六十年代，苏联经常遭到猛烈攻击，北京攻击它搞“修正主义”，拉丁美洲的极左分子指责它放弃革命。鉴于俄国自诩为世界革命的故国，对这种指责是不能掉以轻心的。为了保护他们的左翼，俄国人继续使用武装斗争的辞令，并不时给卡斯特罗的路线以一些口头上的支持。电台号召安第斯山印第安人和其它被压迫集团举行武装起义的广播和宣传加强了。同时也给一些采取武装斗争道路夺取政权的正统共产党(譬如在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有限的武器和金钱的帮助。

哈瓦那会议

1964年11月，二十二个拉丁美洲共产党在哈瓦那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直截了当地排斥了亲北京的和极左的党派。这次会议是在卡斯特罗和老的拉丁美洲党的同意下由苏联发起的。莫斯科的明显的目的是离间卡斯特罗和倾向北京的党派，总之是想使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摆脱北京的影响。这在古巴和正统的莫斯科路线党的关系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事件，因为这使卡斯特罗和全拉丁美洲的老党的领导人第一次聚在一起。

在这次会议上，莫斯科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表示愿意在革命策略问题上向卡斯特罗的观点作出让步。苏联领导人在他们同北京的争端中，从来没有采取过下面的立场，即认为通过和平和选举的道路取得政权是在一切环境中唯一行得通的策略。莫斯科始终坚决主张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道路都是可

行的，而应根据每个国家的环境来决定。然而，在哈瓦那会议之前，莫斯科曾经强调和平道路而贬低武装斗争。在哈瓦那，苏联、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党通过决议号召“积极支持那些目前遭受严酷镇压的例如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巴拉圭和海地的战士们”。莫斯科对这六个国家的武装斗争的赞同体现了一种重要的政策变化，这无疑地使卡斯特罗感到满意，并使他难于拒绝进一步的合作。从卡斯特罗方面来说，在开始有些勉强以后，他在中苏争端中就站到莫斯科一边去了。

由于莫斯科采取了侧重武装暴力行动但又兼容各种不同立场的政策，它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拉丁美洲诸党之间的团结。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其他方面莫斯科就很难有所作为了。这个地区的游击运动由于卡斯特罗在古巴的成功而得到了怂恿，它的兴起使莫斯科和亲莫斯科的党面临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了保持它对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影响并对游击队也发挥一些影响，莫斯科被迫在支持较为慎重的正统的党和主张武装斗争的较为年轻的、急躁的游击队领导人之间保持一种不容易做到的平衡。

会议的公报表明，莫斯科已同意支持游击战争，以换取卡斯特罗同意只同拉丁美洲正统的、莫斯科路线的党打交道。此外，只指望各地共产党对上述六个国家的菲德尔式的叛乱提供支持，至于在别处这些老党可以继续他们的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做法，从而不再受到他们的左翼在古巴的支持下发动叛乱的威胁。哈瓦那会议导致了哈瓦那和北京之间的重大分裂，而开始了苏联—古巴暂时合作的时期。

三大洲会议

三大洲会议不能说是一次亲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人会议，而是由一些不大好下定义的亚非拉“人民”团体在总部设在开罗的亚非团结组织发起下举行的大会。这个会议是由苏联筹划和慷慨资助的，目的是要在第三世界激进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利用卡斯特罗来反对中国。莫斯科希望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规模的运动来代替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因为这个组织已被中苏之间的抗争削弱了。莫斯科的目的是要扩大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把拉丁美洲的亲莫斯科的党加到已经在这个组织内的反北京力量中间去）以便削弱北京充当第三世界领导的权利。在苏联的计划中，卡斯特罗的作用是保证必须由亲莫斯科的共产党来控制出席三大洲会议的拉丁美洲的代表。

卡斯特罗利用会议僭称自己是第三世界的另一领袖，可与纳赛尔或恩克鲁玛相媲美，他们以前曾主持过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会议。他还利用这次会议来部分挽回他在1962年导弹危机的丢脸事件后失去的威信。虽然会议开得没有完全使莫斯科称心，但卡斯特罗和莫斯科彼此都得到了某些他们想从对方那里得到的东西。俄国的代表沙拉夫·拉希多夫表示赞成拉丁美洲的菲德尔式的武装斗争。卡斯特罗则以激烈地大骂中国和放弃在中苏冲突中的中立立场作为报答。这对苏联说来是一个巨大胜利。莫斯科后来申明苏联代表在会议上的讲话并不反映官方政策，这种软弱无力的否认没有得到拉丁美洲的认真对待。会议的干涉主义味道损害了莫斯科苦

心地为自己培植起来的那种和平的外交伙伴的形象，并在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中引起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

卡斯特罗在三大洲会议上成功地得到对武装革命斗争的支持之后，抛弃了他对中苏冲突的超然态度，而更加活跃地介入国际共产主义政治。他立即组织了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相称的地区性组织，叫做拉丁美洲团结组织(OLAS)。这个组织的常务理事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哈瓦那，它的成员包括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亲莫斯科的共产党的代表。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在1967年7—8月之间召开了一次拉丁美洲团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拉丁美洲的大约一百六十名代表。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在调子上是反苏的，这明显地表明，在以卡斯特罗为一方和莫斯科以及亲苏的共产党为另一方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

在这次会议上，卡斯特罗严厉地谴责苏联和苏联集团的国家缺乏革命热情，还批评他们努力和拉丁美洲“反动”政府建立关系。会议赞扬了卡斯特的革命路线，并且好战地重申武装斗争是拉丁美洲的首要道路。不论有无正统的共产党的支持，必须发动革命战争；而且认为任何从事革命斗争的集团都能起革命先锋作用，而不只是共产党人才能起这个作用。卡斯特罗以在哈瓦那设立一个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常设委员会来协调游击运动并对其提供物质支援，这种做法公开地违反了莫斯科在拉丁美洲的更加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

策略。

整个六十年代中期，莫斯科发现自己处于资助了卡斯特罗的革命冒险事业而又不能控制它们的为难境地。如果没有苏联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卡斯特罗政权可能早就垮台了。俄国的国家利益在于同拉丁美洲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也在于促进人民阵线联盟的成立，希望由此而使亲莫斯科的党最终取得政权。但是，苏联共产党的利益有些不同。他们要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的控制下恢复团结，而避免受到北京和哈瓦那从左面来的包围。

拧紧螺丝钉

卡斯特罗使游击运动恢复生气的努力失败了，然而最戏剧性地象征他的失败的莫过于1967年10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死去。从一开始，莫斯科对由卡斯特罗装备、训练和资助的格瓦拉的玻利维亚远征就是抱怀疑态度的，但是他们还是为这次远征提供了若干支持，就象捷克人和东德人所做的那样。格瓦拉的灾难性的结局证实了莫斯科的最坏的预言；俄国人在私下同东欧共产党人交谈时，谴责了卡斯特罗的鲁莽、愚蠢和幼稚的冒险主义。

卡斯特罗被格瓦拉的死弄得惊慌失措，他被迫重新估价了他对拉丁美洲革命形势的显然错误的观点。他放弃了在拉丁美洲有可能重建有战斗力的以他为最高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幻想。武装斗争并没有成功，不可能把它当作攻城破垣的武器来摆脱自己在本半球的孤立状态并增强他和莫斯科较量的

地位。卡斯特罗迫于形势——主要是苏联的经济压力，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以及国外革命的失败——勉强采取了在拉丁美洲收缩革命的架势，同时转向内部，把精力集中在古巴的内部问题上。

在1967年末和1968年初，苏联和古巴之间的关系达到最低点。这多半是由于莫斯科未能反击美国对越南的轰炸。除了东欧以外，苏联阵营的成员显然没有提供什么保护来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两国之间的僵硬关系以及激烈的相互指责在埃斯卡兰特事件^①、古巴对莫斯科倡议的布加勒斯特共产党会议的抵制以及1968年初苏联经济援助的减少事例中是显然可见的。

鉴于这一切，1968年8月23日卡斯特罗表示支持莫斯科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利的讲话就使卡斯特罗的支持者感到惊异。卡斯特罗赞成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也就是维护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所抵制的事情：大国干涉小国的事务。卡斯特罗出人意料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实际上是由自我利益所支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确认，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威胁，莫斯科便有义务加以干涉，这就同样给卡斯特罗政权以较大的安全保证。对于古巴来说，这不是空洞的保证，自从1969年7月起一系列苏联军舰前去访问便是证明。在卡斯特罗看来，1969年以来他一直孜孜以求的苏联对其安

^① 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老路线的共产党人，已不存在的亲苏的人民社会党（PSP）前执行书记，他和这个党的其他三十四名前成员，由于进行所谓的“小宗派集团”活动，反对卡斯特罗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并要求由信奉老路线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而在1968年1月被判以死刑。

全的保证，毕竟已经在望了。^①

莫斯科在1968年初也施加了强大的经济压力来使卡斯特罗就范。对卡斯特罗来说不幸的是，他对古巴经济的荒谬的、反复无常的“独断专行的”管理（这导致六十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计算每年要下降百分之零点六）已大大地加强了莫斯科在哈瓦那的经济影响。^② 俄国人不仅威胁说，如果卡斯特罗抵制他们的要求，就要断绝经济援助和输送石油，而且为了表示他们说话算数，石油的供应减少到涓涓滴滴的地步，还停止了工业原料的输送。东欧国家也随着这样做。当古巴的经济开始停滞不前时，卡斯特罗就被迫投降了。对他的犒赏就是签署了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协定。

卡斯特罗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讲话是古巴业已开始屈从于苏联利益的一个信号。卡斯特罗想必已有了定论，也就是他除了把自己和莫斯科更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外，已无其他选择可言。在他看来，和苏联决裂将会是一场重大的灾难。因为，这会使他不得不依靠西方国家，而从那里他未必能得到他的经济目标和革命抱负所必需的支持。接受莫斯科领导的决定显然不是容易作出的一个决定。卡斯特罗的巨大抱负一直是使古巴回复到真正的独立；而在六十年代初和中期的一段时间里，他看来已一度取得成功。他的错误在于他掌握的资源太少，而他企图完成的目标太多：工业化和社会革命，在

^① 参阅恩斯特·哈尔伯林，《苏联海军力量，苏联—古巴关系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载詹姆斯·D·西伯奇所编《苏联在加勒比的海上力量，政治和战略含意》，纽约：普雷格公司，1972年，第89页。

^② 世界银行地图，华盛顿：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72年。

第三世界充当领导，在拉丁美洲发动革命运动以及把这个大陆从美国势力中“解放”出来。

卡斯特罗发现，由于他十分仇恨美国，他已逐步陷入几乎完全依附苏联的境地。古巴需要武器和经济援助，而对这些它没有支付能力。除俄国外，不存在从其它国家免费得到飞机、舰艇和军事装备的前景。除俄国人外，没有人会年复一年地继续向很少有可能还债的古巴提供贷款。卡斯特罗当然知道他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地位是软弱的。但他无选择余地。他一再向俄国人作出以下的让步：清洗那些莫斯科认为不妥当的情报人员，同传统的亲莫斯科的党合作，不批评苏联，缩减他对革命暴力活动的支持，使经济管理合理化，以及在联合国和整个第三世界中支持莫斯科的政策。卡斯特罗感到越来越难于把这些让步和他对古巴的主权和独立的那种通常的狂热的依恋一致起来。

至于对莫斯科说来，卡斯特的驯化为古巴和苏联在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进行较亲密的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莫斯科看来已判定，对它最为有利的是结束古巴的持久的紧张局势并使古巴和本半球的邻居，首先是委内瑞拉和美国，恢复正常的关系。古巴只有撇开革命的暴力行动（虽然它的革命词令是不需要放弃的）才有可能打破他在外交和经济上的孤立。

卡斯特的新外交政策方针在七十年代初哈瓦那在拉丁美洲发动的外交攻势中是很分明的，这就是不仅笼络进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如阿连德的智利和贝拉斯科的秘鲁，而且也笼络美国的朋友，如特立尼达和巴巴多斯。自1971年

年底以来，古巴的官员们在一些场合曾表示有兴趣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条件是华盛顿愿意取消它的贸易禁运。就苏联方面来说，它曾在私下鼓励古巴和美国拟订解决它们的分歧的办法，并且恢复外交和贸易关系。

古美贸易的恢复显然会使古巴和苏联得到比美国更多的好处，特别是如果美国无法从哈瓦那得到相应的补偿的话。古巴能够从对美国的出口中挣到美元，打开取得美国商业贷款的门路，并且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所需的美国机器和部件（现在是通过第三者得到的）。俄国对卡斯特罗政权的经济补助将会大大减少。在苏联的设想中，古巴和美国进行贸易最终会使古巴赚到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所需要的硬通货（委内瑞拉是卡斯特罗执政前的古巴的主要供应国）。这一来就会解除莫斯科的负担，使它不必再花越来越多的钱来向古巴供应石油，并以目前的每年十亿美元的数额补助古巴经济。

卡斯特罗继续依靠革命的言词来宣传他是拉丁美洲“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神话。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不同了。在超级大国之间出现缓和的时代，卡斯特罗发现自己处于软弱和不自在的境地。由于依靠苏联来生存，他不再受人敬畏，而古巴革命也不足以激励人们去模仿了。只要古巴仍旧如此严重依赖莫斯科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卡斯特罗的外交政策就必须追随苏联的领导；在国外实行和平共处，甚至同美国也是如此，在国内则按苏联方式重建经济。

第八章 苏联海军力量出现在加勒比海域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苏联海军的主要使命是保卫本土免受来自海上的进攻。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头十年中，莫斯科所设想的主要的海洋威胁是西方发动的一种海上入侵。但是当美国获得了一支海上的战略打击力量时，苏联重新安排了它的先后次序，苏联海军政策从此以后把最大注意力放在反击西方打击力量的任务上。莫斯科拨出巨额投资用以发展海军核技术，以及建立一支庞大的、现代化的由军舰和辅助舰只组成的舰队，它加强了苏联采取远距离军事行动的能力。

到六十年代初期，莫斯科采取了向外展开海军力量以便同美国航空母舰打击力量和北极星潜艇的巡航范围求得平衡的政策。不久以前，世界各地的苏联海上部队开始被用于政治和战略目的。在地中海，苏联海军的首要任务在于施行战略防御，但是莫斯科同时强调它所肩负的排除西方反对其阿拉伯保护国的军事能力（主要是美国第六舰队）的政治任务。事实上，苏联通过在埃及塞得港和亚历山大港建立永久性的海军力量，成功地阻止了以色列对这些港口的空中袭击。在更遥远的海域上——几内亚湾、加勒比海和印度洋，苏联海军部队被多方面地用于政治目的：1968年，通过在几内亚湾显示

海军力量迫使加纳释放被扣押的两艘苏联渔船；1969—1970年间，试探美国对在古巴设置的潜艇前进基地的反响；1970年，通过海军访问进行干涉以支持索马里军政府，这次访问一直进行到一次所谓革命密谋被击败为止；同年，通过在几内亚海岸外进行定期巡逻，防止了再次发生得到葡萄牙支持的对几内亚科纳克里的进攻。苏联远洋海军力量在数量、机动性、战备状态方面的加强无疑地将使之得以在将来采取支持外交政策目标的行动，而这是超出战略防御和相互阻遏的海军主要任务之外的。

海军力量出现在加勒比海

1969年7月初，一支由七艘军舰组成的苏联海军中队出现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这标志着西半球政治演变史中新的一章。这是自从1898年7月3日西班牙舰队在古巴圣地亚哥港口外遭到毁灭以来，一个敌对的大国的海军部队第一次进入加勒比海。截至1974年4月，苏联军舰对古巴一共进行了十二次访问：1969年（7月）一次；1970年（5月、9月和12月）三次；1971年（2月、5月和11月）三次；1972年（3月、5月、11月）三次；1973年（8月）一次；1974年至少一次（4月）。这些苏联海军中队差不多数量上半是海面舰只，半是潜艇（包括柴油引擎发动的和核动力的），配有补给船只。

很明显，苏联海军的侵入加勒比海是不能以诸如可以应用于毗邻俄国本土的海域的那种“天然的”俄国利益来解释的。无论在定义上如何引伸，加勒比都不是对莫斯科具有“重

大”安全利益的区域,尽管保存“社会主义的”古巴显然是一个高度优先的目标。苏联人同这一地区的国家并没有长期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而且一支出现在加勒比地区的苏联海军部队在美国力量面前是极端容易受到攻击的。

尽管如此,苏联军舰现在活跃在加勒比海域。看来这出于许多原因。六十年代的史无前例的苏联海军建造计划创立了一支可供在全世界从事显示军旗任务的海军能力,以强调俄国作为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存在着一个可以进入的“社会主义的”被保护国这个事实为海军访问和在暖水地区进行冬季训练巡航提供了方便的理由。不仅如此,苏联仍在加勒比和南美洲一类地区竭力扩大它的影响,在此以前,它一直是被排除在这些地区之外的。

西恩富戈斯的潜艇基地

1970年夏季和秋季,苏联在古巴南部海岸的西恩富戈斯修建了一处核潜艇补给设施。这件事引起了美苏关系中的一次小小的危机。起初有点犹豫不决,接着,华盛顿就警告莫斯科不得有“在古巴或从古巴”对苏联战略潜艇给予后勤维修从而使这个基地进入启用状态的任何企图。1970年10月,这次危机终于结束,苏联同意遵守1962年的肯尼迪—赫鲁晓夫之间的谅解,这一谅解终止了那次导弹危机,并禁止苏联把进攻性武器系统运进西半球。尼克松政府显然同苏联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即对在古巴的潜艇给予后勤维修是违反1962年关于进攻性武器的禁令的。

在西恩富戈斯危机以后苏联的海军活动表明苏联仍在设法以某种形式使苏联海军继续出现在加勒比海。这种出现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表现为支持西大西洋上导弹潜艇的能力，办法是派出潜艇补给船在这个区域活动。另一种可能是由苏联海军的海上舰只频繁访问古巴，这可以料想地会导致海军的常驻古巴。莫斯科使它在加勒比的海军存在逐步升级显然是为了坚持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海军强国的权利，试探美国的反应，并且使美国和加勒比国家对苏联海军的出现感到习以为常。苏联海军出现的这两种形式具有比军事意义更大的潜在的政治意义。

美苏之间的“谅解”看来仅仅在一个方面——尽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限制了苏联在加勒比的海军力量，这就是：导弹潜艇使用古巴基地或从以古巴为基地的补给船获得后勤维修。双方的“谅解”显然不包括不以古巴为基地的船只对加勒比海域内战略潜艇的海上支援，或拥有核武装的海上舰只的活动。随后在1972年11月发生的图-95飞机的飞往古巴以及从古巴基地出发的在美国东海岸外的监视飞行，都强调了莫斯科在这一地区拥有保持军事存在的权利。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卡斯特罗没有象1962年那样对1970年的美苏谅解提出抗议。

目前，莫斯科在古巴有一个充分准备好的前沿锚地，一只潜艇补给船的到来能够随时进入活动状态。苏联海军也已表明它有能力在公海上检修潜艇。那些必要的补给船可以从西恩富戈斯的后勤基地或其他一些港口得到支援。由于得到这种支援，苏联潜艇就能够在它们巡航期间（包括往返西恩富

戈斯的运行时间)所涉及大半个美国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此外,俄国人还能够把他们的Y级战略潜艇的停泊时间延长一倍。

苏联在西恩富戈斯建立基地的企图是同苏联最近为在世界其他地方取得类似的便利所作的努力相一致的。采取这些主动行动,其目的显然是特别要通过使苏联海军有能力在远离苏联的地方连续不断地出现并展开活动,来增进苏联海军力量的机动性。

把海军力量用于政治

炮舰外交的传统目标是对被保护国或殖民地施加政治影响,并保护它们不受各强国对手的干涉。就欧洲的一些帝国来说,陆地上存在的某种行政结构是受到海军力量支持的。帝国时代消逝以后,情况已毫无疑问地政变了。现在,各大国想得到的往往是代价高昂和不知感恩的受庇护者,而不是顺从的和有时是有利可图的殖民地。然而,今天和过去一样,在和平时期仍然以某种形式利用战舰作为外交的补充手段并支持海外遥远地方的政治目标。

在加勒比海,为这类目的而使用苏联海军力量要冒同美国发生军事对抗的危险。在正常情况下,苏联非常谨慎,不愿在一个被认为是美国安全地带而且美国享有压倒的海军优势的区域招致这种风险。但是很可能出现这种机会,使苏联可以利用海军力量在加勒比海和南美海域谋求政治上的利益。苏联在加勒比的军事活动已经帮助支持了古巴政权日益

低落的士气，并且有助于向哈瓦那重新保证莫斯科保护它的受庇护国的决心。另一方面，卡斯特罗无疑知道：苏联在需要的时候并没有支持象埃及这样一些其他的受庇护国，因为这种做法与更广泛的苏联利益发生冲突。

莫斯科由于派遣战舰到加勒比海驻于一个固定的基地而获得了一种潜在力量，来迫使美国从靠近苏联的海面撤退其前沿海军部署。莫斯科在非核化、建立和平区或相互撤退海军的伪装下，经常向西方主动提出一些建议，其目的是制止或限制西方军事力量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活动。例如，1971年6月，勃列日涅夫表示苏联准备谈判一项协定，限制苏联和西方在地中海、印度洋及“其他海洋”的海军部署。^①

虽然莫斯科并没有公开提出美国撤出关塔那摩基地以换取苏联限制海军访问古巴的问题，但是迹象显示莫斯科是准备讨论这样一桩交易的，因为利害的权衡是明显地有利于苏联一方的。除非作为华盛顿与哈瓦那之间一项广泛的解决办法的一部分，否则放弃关塔那摩基地将会是卡斯特罗的一个惊人的胜利，而对美国在加勒比其他地方保持军事设施的能力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管怎样，莫斯科知道，它对古巴的海军访问和在古巴保持军事力量是在未来同美国的谈判中有价值的讨价还价的资本。

在某种情况下，苏联人可能会通过加强他们在加勒比和南美地区的军事力量而在这些地区得到一些政治利益。俄国人不断地力图加强拉丁美洲政治中的左倾潮流；而莫斯科传

^① 《真理报》，1971年6月12日。

播的信息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力量只有同苏联集团紧密合作才能取得胜利。苏联海军力量在西半球更加强有力的出现能够给这种说法增加更大的可信性。

此外，苏联海军出现的潜在可能性不仅限于“显示军旗”或影响当地的态度。使用武力的可能从来没有从苏联的策划里排除，特别是在象海地这样的国家里，在那里不适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发生当地大动乱时，苏联海上战舰在这地区的出现很可能会阻止美国的干涉，就象他们现在在中东所做的那样。如果古巴内部发生了对古巴政府的挑战，苏联海军的出现也会抵销某些反对派力量。

然而，重要的是，不要过分夸大这些危险。正在改变的美苏关系的性质更可能的是在拉美促进了谨慎和克制，而不是冒险主义。但是，这种新关系的结局如何仍然有相当大的不可靠性。今后的一些年头将要决定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究竟主要是合作性质还是敌对性质的。同时，在拉丁美洲看到一个对立的军事力量出现，这件事所造成的潜在的长期风险是不应该轻易地不加理会的。

第九章 苏联外交的主要目标： 智利与秘鲁

1935年莫斯科派秘鲁共产党杰出的组织家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到智利，去执行已经取代了共产国际极左战略的“统一阵线”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战略。从此以后，智利共产党总的说来一直奉行一种广泛联盟和有限目标的战略。作为拉丁美洲最忠实的亲苏政党之一，它无条件地支持苏联集团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该党的命运多年来因国内和国际事态的发展西几经变化，它毫无保留地支持苏联外交政策的各种变化和转折，并重复莫斯科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调调。

智利共产党至少在1973年军事政变以前，是拉丁美洲最有组织和最强大的党。1956—1969年间，它同智利社会党——它的更富有战斗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劲敌——建立了不稳固的选举联盟。但在1969年，共产党人确定，为了把智利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基础广泛得多的左派力量的联盟。于是，共产党人在1969年末建立人民团结阵线（六个左翼政党的联盟）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以萨尔瓦多·阿连德为首的人民团结阵线1970年选举获胜后，共产党人成了该联盟中唯一最有影响的力量。在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

它在联盟中比它的最接近的对手、意识形态上不大稳定的和富有战斗精神的社会党要好得多。

智利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在整个阿连德统治时期并未动摇过。它要利用智利民主制度的弱点，并建立共产党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① 得到阿连德和社会党内“温和派”赞同的战略，就是要通过全民投票的合法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宪法。^② 动员群众、打进智利的各种组织机构以及同反对党建立策略上的联盟，这些都被用来造成足够的人民群众的支持。议会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取代，现行的法律制度要由“人民法庭”来代替。阿连德总统保证要维护保障法（其目的在于责成他的政府保持智利的民主自由和制度，以换取议会的支持），这不过是为了夺取政权的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就象他后来所解释的那样。^③

阿连德在当选后不久就宣布的智利道路，在西方广泛受到误解。在国内外正式宣扬的概念，就是一种独特的走向新型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智利道路，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基本的自由、经济多元化和自由选举都得到普遍的尊重。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受到欺骗，竟然相信阿连德

① 参阅埃德华·拉瓦尔卡：《科尔巴兰二十七小时》，圣地亚哥，基曼图出版社，1972年版，第110页。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说：“对我们（共产党人）说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需要把无产阶级变成领导阶级，变为决定性的社会力量。”

② 萨尔瓦多·阿连德在1971年同雷吉斯·德布雷谈话时说：“至于当前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正设法去克服它，去推翻它。”雷吉斯·德布雷，《智利革命，同阿连德的谈话》，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71年版，第82页。

③ 同上书，第119页。

政府正在智利缔造一种新的西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概念同阿连德革命雄心的现实毫不协调。

智利共产党人及其莫斯科的盟友对萨尔瓦多·阿连德所鼓吹的智利道路的思想含意感到不安，^①并且不同意把它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的智利道路，因为它表明，在人民团结阵线取得全部权力以后，共产党人不一定要起领导作用。智利（共产）党支持莫斯科的和平道路的理论，这种理论承认自由选举和“人民多元主义”是在智利条件下一种短期的策略手段，而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苏联型式的共产党专政。这条和平道路并不象这口号的含意那样是什么“和平的”。它包括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除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外的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和暴力行动。

阿连德的外交政策很受莫斯科赏识。它强调“多种意识形态并存”（即同一切国家建立关系，而不问其意识形态和内部政治特性如何），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没收美国的投资，鼓励在拉丁美洲建立“反帝阵线”。在阿连德执政期间，原先同美国的密切关系已为同“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同古巴和苏联的牢固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所取代。智利外交部长科洛多米罗·阿尔梅达在1971年5—6月间到苏联和东欧访问，这是他到拉丁美洲以外地区的第一次旅行。阿连德总统在1972年12月到莫斯科访问。牢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关系，把智利共产党同苏联党的领导、把萨尔瓦多·阿连德同

^① 参阅埃德华·拉瓦尔卡，《科尔巴兰二十七小时》，圣地亚哥，基曼出版社，1972年版；路易斯·科尔巴兰，《胜利之路》，圣地亚哥，1971年版，第32、35页及59—60页，作为共产党立场的权威性言论。

菲德尔·卡斯特罗联结起来。

阿连德总统称呼苏联为智利的“老大哥”，这不单单是为了说得好听；它反映了他的一种期望，希望苏联成为智利革命的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盟邦和他的政权的主要经济支柱。事实上，莫斯科确实成了对人民团结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主要源泉。在1971—1973年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总数达六亿二千万美元（其中，一亿五千六百五十万美元为短期贷款，四亿六千三百五十万美元为工程援助和物资供应贷款）的款项中，^①苏联就提供了二亿六千零五十万美元（九千八百五十万美元为短期贷款，一亿六千二百万美元为经济援助），但大部分从未动用过。这同阿连德所需要的大量援助比起来还差得多。但是，莫斯科并不认为，它的经济合作会对（智利的）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随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它肯定会有助于减轻智利对美国的依赖。

由于智利共产党忠于苏联，以及苏智经济、技术、科学与文化合作的扩大，苏联在智利的影晌迅速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莫斯科对智利经济状况的恶化、对极左派和极右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对反对派日益增强的组织性和力量，越来越感到不安；而在人民团结政府在1973年3月得不到大多数选民对它为通过和平和宪法手段来变革智利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所需的支持之后，情况尤其如此。

然而，莫斯科并不愿意提供大量短期的商品援助（如粮食），也不愿意提供可兑换的货币用作无条件贷款；而阿连德

^① 参阅《智利的外债》，圣地亚哥，智利发展公司外国信贷局，1973年，第6卷。

政权正是需要这些贷款来进口粮食、零件和机器以缓和国内的匮乏。莫斯科的九千八百五十万美元的短期银行贷款毫无疑问是有帮助的，但离智利的进口需要还差得很远，仅粮食一项，在阿连德政权垮台之前，一年就需要约七亿美元。苏联领导对智利共产党和人民团结政府的官员说，要改善经济状况，主要的努力必须由阿连德政府作出。^① 莫斯科一再强调，人民团结政府必须把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出现灾难性下降的局面扭转过来，这样才有可能争取到大多数智利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莫斯科不愿向阿连德提供他为改善其日益恶化的生存条件所需的硬通货贷款，而只满足于在国内外组织什么声援集会，指望这些表态活动会“传到智利人民的耳朵里”。^② 归根到底，当阿连德总统及其人民团结政府的灾难性政策终于使和平道路破产的时候，莫斯科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

事实上莫斯科在智利采取两面手法。在国家关系上，苏联慎重行事，采取一种不干涉的姿态，鼓励反美和摆脱美国而独立。由于莫斯科认识到国内力量的对比对武装斗争不利，它敦促人民团结政府领导人保持内部团结，拒绝极左派的“挑衅性的和冒险的”主张，避免可能导致内战的行动，采取更合理的经济政策，并巩固革命成果。但在同时，莫斯科却不去阻止古巴直接介入智利革命。古巴在一个友好的、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政府及其马克思主义总统的保护下，把大量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武器由古巴飞机和商船运交给智利的左派激进分子。古巴还在智利设立了一个游击训练基地和协调

^① 智利共产党领导人在提到苏联援助时常常重复这种“自力更生”的论调。

^② 莫斯科电台(西班牙语)1973年8月19日广播。

中心。古巴驻圣地亚哥大使馆的一个庞大的谍报组同阿根廷、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的解放运动保持联系。由苏联控制的古巴情报机构——古巴情报总局也同智利的极左分子及其他流亡在智利的革命团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向他们提供在智利及其他拉美国家进行武装斗争时所需的训练、武器和资金。

苏联军事人员也直接参与革命工人从事城市游击活动的训练。这样的事情于1972—1973年发生在瓦尔帕莱索附近的埃尔别洛托，苏联曾在那里建立了一座为阿连德政府生产房屋预制构件的工厂。这家公司雇用二十个俄国人，其中八人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十二人是陆军军官。这十二名军官在工余时间教那些经过特别挑选的革命工人的骨干分子如何使用武器、进行巷战和城市游击战术。这家苏联建立的工厂处于智利海军情报处的经常监督之下。1973年9月11日早晨智利海军情报处逮捕了这二十个俄国人，几天之后把他们驱逐出境。^①

这种秘密参与在智利训练游击队的活动，对莫斯科官方宣布的完全支持通过合法与和平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来说是一个例外。但是，俄国所遵循的活动原则是，既然无法预见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不测事件，因此最好采取一些即便同官方路线“相抵触”的预防办法，免得事后悔之莫及。在智利，显然有着把某些武装革命分子置于苏联直接控制之下的好处。这样，莫斯科就有可能在智利极左分子一旦夺取政权成

^① 《埃尔西利亚》周刊，1973年10月10日—16日，第1期；以及著者1973年12月同智利军人的谈话。

功的时候对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影响。

苏联千方百计地从它对智利的技术援助计划中捞取最大限度的好处。莫斯科向智利国有化的铜工业派出了四十六名技术人员，这些人全部干着收集工业情报的勾当。据智利矿业技术人员揭发，苏联专家们在逗留智利的两年中，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帮助改进采矿工作，主要是忙于收集有关美国采矿设备、技术、生产组织、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情报。^①莫斯科对智利的渔业和与渔业有关的活动（海洋学、水文学和海洋生物研究）也很感兴趣。对智利提供的渔业援助，使苏联的渔船、海洋船及其他船只能够进入智利的港口，让智利人对苏联在海洋上的出现感到司空见惯，并为苏联在别的海域内建立它的势力打开局面。苏联船只越来越多地在智利水域、在海角周围以及靠近南极洲的海域出现，也为苏联海军收集情报和海洋资料提供掩护。

苏联在1971年表示愿意向阿连德提供三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莫斯科希望在向拉丁美洲的非共产党国家供应军火方面创立一个重要的先例，并进一步削弱华盛顿与拉美军事领袖之间早就紧张的关系。但是，智利军人拒绝接受这个建议，并决定继续从美国和西方其他供应国购买军火。^②日益增长的暴力威胁和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使反共的军事领导人感到

^① 智利铜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安德烈斯·佐希克里奇1973年12月对作者的谈话。

^② 1971年10月，智利政府正式否认说，并未就供应军火问题同苏联进行过任何谈判，苏联方面也未提出过什么建议（拉丁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年10月19日电）。但是，据智利最高军事司令部消息，莫斯科曾经提出过供应三亿美元军火装备的建议。

不安。他们很不愿意转向苏联谋求军火，从而削弱他们同美国和西欧的关系。尽管美智的官方关系冷淡，但在阿连德执政期间，美国仍继续保持同智利军方的友好关系。

阿连德政权的虚弱，莫斯科是很清楚的。它是一个少数党政府（1970年人民团结联盟只获得百分之三十六的选票，1973年是百分之四十三），而且武装部队和强大的国民警察都是强烈反共的。既然“民主力量”缺乏足够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因此莫斯科主张智利共产党人应当逐步夺取政权，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武装斗争。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极左派和极右派经常遭到苏联报纸的攻击。蓄意与反对党作暴力对抗的极左组织——左派革命运动，则遭到特别猛烈的抨击。它被谴责搞“革命冒险主义”、造成政局不稳定和损害人民团结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的前景。

莫斯科从1972年年中开始认识到，对阿连德政府的反抗发展得很迅速。只是由于阿连德的精明——善于在自己政府内部各种破坏性力量之间保持平衡，才能把智利社会分崩离析的组织搞在一起。经济管理不善、农业和工业生产的下降、通货膨胀的加剧和收支差额的不断恶化，继续受到严厉的批评。苏联的观察人员建议放慢接管经济的步子，先把大公司收归国有，而把小型和中型的公司暂时放在一边。在军事政变发生之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看到了凶险的预兆，敦促（阿连德政府）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同反对党（特别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合作，并且自始至终避免武装冲突。

后来，阿连德在1973年9月11日的垮台使莫斯科深感不安，但并不特别感到震惊。塔斯社承认：“智利经验是痛苦

的和戏剧性的”，^① 而菲德尔·卡斯特罗说，“智利事件”使他“感到很不舒服”。^② 莫斯科以军政权所谓迫害苏联官员为理由，断绝了同圣地亚哥的外交关系。新政权上台还不到一星期，就开始感到苏联恼怒和沮丧情绪的大发作，这种情绪在它发动的旨在孤立和诋毁智利新政权的一个持续和精心安排的宣传运动中表达出来。苏联宣传工具指责军政府“以无比的残酷迫害左派分子”。^③ 它们报道说，“圣地亚哥的街道上洒满鲜血”，^④ 还说“数以万计的智利民主分子”遭到杀害。^⑤ 据它们报道，阿连德总统已经“被残忍地谋害”，或者是同叛乱分子搏斗后英勇牺牲。据它们报道，阿连德的住所已被“夷为平地”，作为报复。^⑥ 军政府枪击妇女和儿童，借以恫吓人民。^⑦ 塔斯社愤怒地谴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智利“反动派”和“美国垄断资本”组织这次军事政变。^⑧ 甚至连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位并不以对西方民主事业热心而著称的人，也对“惊人的、彻头彻尾地违反一个国家的宪法，粗暴地蔑视一个整个民族的民主传统的行为”表示震惊。^⑨

阿连德政府的被推翻是莫斯科在拉丁美洲推行的统一战

① 塔斯社 1973 年 9 月 20 日报道。

② 塔斯社 1973 年 9 月 13 日报道。智利军政权以哈瓦那公然干涉智利内政为理由，立即同它断绝外交关系。

③ 莫斯科电台 1973 年 9 月 18 日广播。

④ 《真理报》，1973 年 9 月 26 日。

⑤ 莫斯科电台 1973 年 10 月 28 日广播。

⑥ 莫斯科电台 1973 年 9 月 18 日广播。

⑦ 莫斯科电台 1973 年 9 月 28 日广播。

⑧ 塔斯社 1973 年 10 月 29 日报道。

⑨ 莫斯科电台 1973 年 10 月 26 日广播。

线策略的一个挫折，而且对西方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早就认为智利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样板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便着手使自己摆脱阿连德灾难的影响。在智利推行的统一战线策略，不但不能走向社会主义，反而使智利进入一个前所未闻的政治暴乱、智利工人和中产阶级蒙受巨大痛苦、智利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拉丁美洲的非共产主义政党和武装力量也忘不了同极权主义政党结盟的严重危险。

秘鲁的革命将领

自从1968年军事政变推翻了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雷总统的政府以后，莫斯科也特别注意秘鲁。以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为首的秘鲁新军政权，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政府，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美的倾向。它宣称执行中立主义或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秘鲁在几年之内同苏联和古巴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这不是由于共产主义“宣传”或“渗透”的结果，而是国内激进化进程的一部分。

在军人接管政权的时候，在秘鲁存在对美国的强烈不满情绪。美国六十年代的政策在（秘鲁）武装力量中激起强烈的反美潮流。华盛顿拒绝向秘鲁空军出售超音速飞机，同时却强迫贝朗德政府不要买法国的海市蜃楼飞机。根据“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拨给秘鲁的钱为数很少；而且，总的说来，华盛顿对1968年军政权采取冷淡的态度。由于渔业纠纷和（秘鲁）

没收国际石油公司的资产，(美国)停止(向秘鲁)出售一切军火和提供经济援助，但这一来只使得事情变得更糟。秘鲁许多文武官员感到他们被一个历来友好的国家背弃了。

经济落后、国内社会问题、文职官员的腐败和无能，也促使秘鲁军人变得激进起来。在高级军事研究中心的军职和文职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在对付左派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军的反游击战的推动下，秘鲁军人发展了同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相联系的自己的学说。现存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开始被认为是这样的缺乏效能和不公正，以致严重地威胁着国家安全以及军事体制的继续存在。不仅共产党人可以利用这些条件，而且同据说主张秘鲁保持落后状态的美国利益集团结成联盟的秘鲁寡头统治阶级也可以利用这些条件。

贝拉斯科政权很快就引起苏联的注意。军政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无偿地没收了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国际石油公司所拥有的、资产为二亿美元的拉布雷亚油田和塔拉拉炼油厂。贝拉斯科政权声称，国际石油公司是一个特殊的事例，它并不表明对外国企业都将全部没收而不给予赔偿。但是，一九六八年以来的趋向一直是一步一步地在采矿、银行、制造、交通、运输等业、某些商业领域和鱼粉工业中消灭外国投资。贝拉斯科政权稳步地推行它的征收外国企业的计划，但是如果秘鲁不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那是实现不了的。秘鲁政府全部没收国际石油公司和拒绝对其他被没收的美国资产支付一点赔偿费，这使它同华盛顿的关系大为紧张起来。1974年2月，秘鲁军政府提出了一项谋求解决的认真的建议。它同意付出七千六百万美元作为对被没收的公司的

赔偿费，另付七千四百万美元作为利润、股息和专利权使用费。^①

贝拉斯科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根本改造经济的措施。根据新的法律和法令，在所谓“改革了的”私营部门设立了工矿业“公社”（保证工人参加管理和分红）。国营部门大为扩充和加强，新的“社会财产”企业被批准成立。尽管政府声称它同意几种形式的生产性企业并存，但是，改革的目的在于实际上消灭在秘鲁的私营企业；剩余的私营企业将划归由小批发商、零售商、手工业者及其他小企业组成的一个小小的“纯粹”资本主义部门。

这些措施究竟是（象某些批评政府的人所断言的那样）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象贝拉斯科所说的那样）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独创的“第三条道路”呢？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改革是方向正确的步骤，因为它们破坏了私有制的基础，使秘鲁明显地朝着脱离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向移动。苏联的官方评价是：秘鲁正“谋求它自己的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一旦抛弃资本主义”，秘鲁将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②支持军政府的秘鲁共产党认为，“工业化”是“顺次导向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③不管其最后结果如何，由新兴的高级军人—技术人员控制许多经济部门，这表明国内正急剧左倾。

① 《纽约时报》，1974年2月20日。

② 瓦·吉赫撰述大文章，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形势》杂志，1971年，第3期。

③ 参阅秘鲁共产党总书记豪尔赫·德尔普拉多的声明，载《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1971年，第1期。

作为“意识形态多元主义”和不结盟的实用主义典型，贝拉斯科政权要使它自己迎合苏联是相当容易的，只要俄国的援助是唾手可得的。据认为，苏联是一个强大的、但距离较远的国家，可以利用它的支持来对付美国的压力，而使之对秘鲁有利。坚决反共的秘鲁军政府不怕苏联的统治或渗透。它要苏联（和古巴）肯定其独立的外交政策路线，作为报答，它也有某些东西可以提供。秘鲁是石油、渔业资源及世界所需求的其他原料丰富的国家；选择它作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潜在样板和苏联经济合作的陈列橱窗，也比阿连德的智利好。

七十年代初期，同古巴、特别是同苏联的政治与经济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秘鲁军人给人的印象是，它对苏联比对其传统的西方盟国更为友好。在1973年和1974年的很多次讲话中，贝拉斯科总统及其他军人部长大大地赞扬了苏联和古巴，而专对西方强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对美国进行批评。^① 贝拉斯科总统在1973年年底回顾同苏联的五年外交关系时说：秘鲁同苏联的关系“是很有希望的”，而且变得“在各级都更加密切了”。^②

贝拉斯科当政之后，秘鲁同苏联的经济关系不断发展，但是象阿连德的智利的情况一样，这并没有达到两国所作的过分渲染的程度。秘鲁曾希望靠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取得援

^① 在秘鲁总理埃德加多·梅尔卡多·哈林将军、矿业和动力部长豪尔赫·费尔南德斯·马尔多纳多将军和渔业部长哈维尔·坦塔莱安·巴尼尼将军的讲话中，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在最近几年中特别明显地流露出来。

^② 拉美社利马1973年12月20日报道，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总统1973年12月19日在利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助和贷款，来弥补由于执行没收和反资本主义政策而引起的来自美国、国际信贷机构和外国投资者的资本输入的减少。但是，使秘鲁政府大失所望的是，苏联并没有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在贝拉斯科政权的头四年(1968—1972年)中，俄国只提供了二千八百万美元的贷款，而东欧(译注：系西欧之误)则提供了一亿七千三百万美元。苏联的技术援助大多采取为某些特定的工程进行勘测和规划的形式；据说这些工程将来会导致同秘鲁的经济合作。莫斯科拒绝对三亿五千万美元的奥尔莫斯水电灌溉工程提供资金，只同意在最初阶段承担为期三年的、费用为六百万美元的蓝图研究。苏联曾同意对四千五百万美元的帕伊塔渔港设施提供大部分资金，但此事经过大肆宣传之后，莫斯科只提供了一百八十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和机器设备。1972年9月，苏秘双方签订了为期十年的渔业合作协定，其中包括对秘鲁沿岸海域和渔业资源进行调查。

1973年9月阿连德政府的垮台，使莫斯科把注意力集中在秘鲁，把它当作南美“反资本主义”和“反帝”阵线的一个最有希望的成员。1973年年底，秘鲁成了西半球除古巴之外接受苏联军事援助的第一个国家。莫斯科和利马曾经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将近两年。但是，据报道，只是在阿连德垮台以后，苏联才同意按极为慷慨的、特许的条件，向秘鲁陆军提供大约二百辆“T—55”中型坦克、重炮及其他装备。^①坦克于1973年11月开始运交；十五名苏联军事顾问随即抵达秘鲁，指导使

^① 1974年2月的《华盛顿明星-新闻报》和西方情报方面人士提供的消息。

用这些装备。^①直到1973年12月底，当西方报刊已经作了报道以后，贝拉斯科政府才承认苏联武器运到秘鲁，但仍否认有苏联军事顾问在秘鲁。^②

据说，苏联的军事援助是表明贝拉斯科政府有能力作出“独立的决定”（就是说，采取反美措施）的又一个例子，^③但是，它也在国内和本地区内引起可能具有深远意义的反响。在秘鲁，它加深了某些军方人士和文职人员对贝拉斯科总统同苏联和古巴紧密合作的政策的不安情绪。武装部队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某些高级军官认为，让苏联和古巴插足进来，风险大于好处。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苏古在智利的革命活动，在他们的脑子里记忆犹新。他们决不相信，象贝拉斯科总统所说的，苏联是遭受歪曲宣传之害的一个宽厚和友好的国家。

军事援助协定还标志着在实施秘鲁雄心勃勃的、耗资巨大的谋求军火计划方面又前进了一步；这个计划在贝拉斯科政府头五年（1969—1973年）总共耗资十亿美元。^④秘鲁努力使安第斯地区的军事平衡转而有利于它，这正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智利引起很大的不安（智利已经失去了它过去所具有的武装优势的地位），促使这些国家扩大军事现代化计划。智利特别害怕秘鲁军队要把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丢失

① 1974年2月的《华盛顿明星-新闻报》和西方情报方面人士提供的消息。

② 拉丁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年12月19日报道。

③ 参阅贝拉斯科总统1973年12月19日讲话，拉丁社在当天的报道。

④ 《世界军费开支，1971年》，华盛顿：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1972年；《军事平衡，1971—1972年和1972—1973年》，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72年和1973年。

给智利的土地重新夺回的复仇主义图谋。由于秘鲁已在武器和军舰的数量和质量上占有优势，因此它主张在拉丁美洲冻结武装十年，以巩固它在安第斯地区的地位。

苏联领导人不是没有看到秘鲁革命的潜在重要性。莫斯科认识到，由于贝拉斯科政权准备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奉行具有强烈反美色彩的外交政策，这个政权可以帮助削弱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莫斯科认为，秘鲁是拉美军队内一股强大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潮流的先驱。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雄心勃勃的将军们已受到秘鲁范例的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已致力于国内社会改革：扩大国营部门，限制外国投资，重新分配收入以利于贫苦群众。莫斯科看出，对于秘鲁式的民族主义政权（它们认为反美是团结和讨价还价的力量源泉），通过外交和经济途径更容易影响它们，长期的共产主义渗透比那种行之无益的直接颠覆手段对它们更加行得通一些。

尽管莫斯科对秘鲁革命有很大的兴趣，但是看来莫斯科遵循一种有限的经济许诺和政治冒险的政策，这在对智利的政策中是显而易见的。贝拉斯科将军被苏联领导人认为是一个不完全靠得住的“朋友和盟友”，他既能转向同美国密切合作，同样也能加强他的反美情绪。这多半取决于华盛顿政策的巧妙程度，以及秘鲁高级军人和技术人员同秘鲁社会中政治力量的对比。

秘鲁军事领导人不大会很快放弃他们这样的雄心：在第三世界内成为一支强大的势力，建立一个能够向工业化世界提供条件的第三世界矿物输出国的有效的联盟。看来只要秘

鲁激进的国内改革和国外的实用政治收到效果，美秘关系的特点很可能是冲突和冷淡。不管怎样，莫斯科同秘鲁的关系一贯反映它对任何削弱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的行动给予有条件的支持和鼓励的战略。

12345678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甲乙

第十章 苏联进展得失的总结

苏联看到在拉丁美洲有一个迅速变化着的环境，企图加以利用和施加影响以有利于自己。今天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毫无疑问比十年前加强，但是还远不是支配一切的地位。俄国人的活动只是在古巴有较大的势力，他们在那里的关系具有殖民主义色彩。在拉丁美洲的其它地方，美国、西欧各国和日本对局势的发展有着最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发生变化。苏联的进展一直是逐步的，而且不是没有挫折的；但是，同美国战略收缩和在这个地区采取低姿态的政策相反，苏联取得了某种势头。

苏联影响的增长不是由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尽管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广为传播的和有影响力的），而是由于在各种不同的水平上努力交朋友的结果——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发生争执的时候给予它们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苏联政策经常强调，同帝国主义的援助相反，这种援助是“无私的”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既不谋求军事基地，也不谋求政治屈从。但是，苏联给予经济支持，是为了把美国和西方国家排斥于取得原料和动力资源的大门之外，加强国营经济部门，培植一个主张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友好的、受苏联训练的军人和技术人员统治阶层。为达到它的目的，莫斯科毫不迟疑

地同军事独裁和反动政权以及极左革命分子合作。

苏联迄今在拉丁美洲所取得的唯一显著的进展——古巴——并不是由于“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或者由于“统一阵线”策略的胜利。苏联是被请进来而牢固地站稳了脚跟的。俄国在加勒比得到了一个仆从国，这是由于激进的民族主义革命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仇恨美国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外部的压力。况且，古巴对苏联来说并不是纯粹的好事。钱花了许多，力也出了不少，但是，贷款和武器并不是始终按照莫斯科所赞成的方式来使用的。苏联提供援助是为了把古巴当作说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陈列橱窗，但是，古巴微小的经济成就已经被大多数其它拉丁美洲国家所超过，只有海地和乌拉圭这两个突出的例外。它在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成就给人印象较为深刻，但即使在这方面卡斯特罗政权近几年来也承认，在教育和保健事业的质量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苏联政策的目标是，扩大它的影响而不挑起同美国的正面冲突，对进程远非顺利的和缓也不产生不利的影晌。阿连德的智利和贝拉斯科的秘鲁得到苏联的一些支持，但还不是象提供给古巴的那种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莫斯科不愿意去拯救阿连德政府是一桩使人大为失望的事，而且对莫斯科在拉丁美洲的声誉是一个打击。阿连德垮台以后，秘鲁在苏联计划中代替了智利而成为南美反美阵线的领导者，变成古巴在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中最亲密的盟友。^①

^① 秘鲁和古巴的关系在 1972 年和 1973 年变得显然更加密切起来。秘鲁外交部长在 1973 年 10 月访问了古巴，并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重申要谋求建立一个新的、把美国排除在外的拉丁美洲组织。声明全文见《格拉玛报》1973 年 11 月 11 日(英文版)。

今后苏联政策可能朝什么方向发展，拉丁美洲国家会有什么反应，这些都不清楚。最可能的是，莫斯科将继续抓住种种机会利用拉丁美洲的反美民族主义以有利于自己，并破坏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但是，苏联在这个地区（古巴除外）缺乏重大的既得利益，这个地区离苏联远而离美国近，加上莫斯科把宝押在缓和上面，这一切有助于减少采取更富侵略性的政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进行“渐进的”社会变革。而同美国和中国的全球争夺也促使俄国在第三世界一些象拉丁美洲的地区谋求政治好处，否则的话，那些地区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出现缓和，在莫斯科方面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它要放弃那种对于拉丁美洲出现的变革，只要可以用来反对美国，就都要加以利用的政策。

在六十年代，莫斯科和华盛顿曾经就势力范围达成谅解，而且仍旧在遵守某些竞赛规则。但是，战略平衡、美国从海外一些没有掩护的阵地所作的战略撤退、它对外国原料和能源供应的日益增长的依赖、以及停步不前的东西方和缓进程，这一切使得许多问题重新出现。俄国海外军事和经济能力的增长、它在拉美的越来越广泛的出现及其乐于利用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弱点和冲突的意愿，很可能对竞赛规则产生影响，至少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对通常被视为传统的“势力范围”相互进行渗透，这种状况现在越来越被人们所广泛接受，而拉丁美洲已不再被看作是美国独占的禁区了；就连华盛顿也持这样的看法。

莫斯科指望利用战略平衡（一种更好的“世界力量对比”）和东西方的和缓在拉丁美洲创造一种政治气候，它有利于拉

拉丁美洲在政治上的激进化,瓦解泛美体系,更加对美国保持独立性,剥夺美国对战略原料和能源储备的所有权,以及总的说来更加密切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系。将继续运用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来加速这一进程,即使(从政治影响的角度来衡量)其效果常常是微乎其微的。

拉丁美洲在东西方和缓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这点从来不是清楚的。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在世界政治中从未占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性,甚至巴拿马运河在核时代也已丧失其大部分战略价值。在加勒比和南美取得军事设施可能是有用的,但这不论对莫斯科还是华盛顿的安全来说绝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地区的未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能力和 policy;而美国的政策同苏联的目标比较起来看还不太明确。很多事情都要决定于美国政策在全球积极行动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总趋向,以及决定于就拉丁美洲在美国的全球优先考虑的事项和义务中占多大地位所作出的决定。美国孤立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可能给苏联开辟新的可能性,如果拉丁美洲国家认为同美国对抗比同美国合作能搞得到更多好处的话,情况将尤其如此。美国地位的削弱最终可能导致泛美体系的解体和拉丁美洲的中立化。目前美国似乎不可能作进一步的退却,特别是鉴于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1973 年年底以来提出了旨在加强泛美团结和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与冲突的倡议(名曰“新对话”)。但是,可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

至于苏联方面,七十年代外交活动和经济援助的扩大,也可能促使某些拉丁美洲国家逐步调整它们的外交政策以适应

这种“新现实”，如果加上苏联的军事活动，情况尤其如此。人们应当记得，三十年代轴心国家日益上升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形象，曾经促使法西斯思想和亲法西斯政权在西半球扩展起来。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巴西的“主张一体化的人”就有着思想共鸣；在其它地方，如智利和阿根廷，主张中立的人对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不断增长的力量印象很深，他们敦促自己的国家不要卷入就要爆发的欧洲战争。在某些情况下，采取了彻头彻尾的亲轴心国家的政策；而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则采取“中立的”或“非对抗的”姿态。类似的情况可能会重新出现，但是，鉴于目前许多外部势力正在这个地区争相施加政治影响和争夺经济利益，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去夸大这种变化可能发展到什么地步。

总之，拉丁美洲现在正处于来自本半球以外的多种势力影响之下。为了争取更大的行动自由，很可能是，自身的利益和谋求生存的本能将使大多数（即使可能不是全部）拉丁美洲国家起来对抗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统治。拉丁美洲国家已经进入世界舞台，它们坚持要求参与影响到它们命运的决策。把拉丁美洲同东西方和缓进程、同正在出现的大国均势、同世界发展与稳定的重大问题隔绝开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附 录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和极左派的状况

1973

国 家	党的名称	人 数 (约计)	立 场	是否 合法
阿根廷	阿根廷共产党	70,000	亲莫斯科	合法
	人民革命军	不详	托派	非法
	解放武装部队	不详	亲卡斯特罗	非法
	革命武装部队	不详	亲卡斯特罗	非法
	蒙托内罗斯	不详	卡斯特罗—庇隆主义派	合法
	庇隆主义武装部队	不详	卡斯特罗—庇隆主义派	合法
巴巴多斯	没有共产党			
	人民进步运动	微不足道	极左派	合法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共产党	1,500	亲莫斯科	非法
	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	1,100	亲北京	非法
	革命工人党	175	托派	非法
	民族解放军	不详	亲卡斯特罗	非法
巴西	巴西的共产党	7,000	亲莫斯科	非法
	巴西共产党	不详	亲北京	非法
	民族解放行动	微不足道	亲卡斯特罗	非法
	革命人民先锋	不详	亲卡斯特罗	非法
智利	智利共产党	12,000 ^①	亲莫斯科	非法
	左派革命运动	微不足道	亲卡斯特罗	非法
	人民工人先锋	微不足道	不明确	非法

国家	党的名称	人数 (约计)	立场	是否合法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共产党	10,000	亲莫斯科	合法
	哥伦比亚共产党 (马列)	1,000	亲北京	合法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	100②	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游击队	非法
	民族解放军	100③	亲卡斯特罗	非法
	人民解放军	50④	亲北京	非法
哥斯达黎加	人民先锋党	1,000	亲莫斯科的共产党	非法
古巴	古巴共产党	125,000	独立的⑤	合法
多米尼加 共和国	多米尼加人民运动	385	亲卡斯特罗	非法
	多米尼加共产党	470	亲莫斯科	非法
	“六·一四”革命运动	300	各种意识形态	非法
	多米尼加共和国共产党	145	毛主义派	非法
	无产阶级之声	65	亲北京	非法
	人民社会党	40	亲莫斯科	非法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共产党	500	亲莫斯科	合法
	厄瓜多尔共产党 (马列)	250	亲北京	合法
	厄瓜多尔革命社会党	450	不明确	合法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共产党	125	亲莫斯科(有一个主张暴力的派别)	非法
瓜德鲁普	瓜德鲁普共产党	3,000	亲莫斯科	合法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劳动党	750	亲莫斯科(拥有一支小型恐怖主义力量,称为革命武装部队或危地马拉劳动党革命武装部队)	非法

国家	党的名称	人数 (约计)	立场	是否合法
圭亚那	圭亚那劳动人民 先锋党	100	亲莫斯科	合法
	人民进步党	100⑥	亲莫斯科	合法
海地	海地共产主义者 统一党	不详	海地共产主义者统一党 1968年由亲莫斯科的 党和亲哈瓦那的党合 并而成，目前没有活 动。	非法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共产党	300	亲莫斯科 (存在革命的 派别)	非法
牙买加	没有共产党			
马提尼克	马提尼克共产党	1,000	亲莫斯科	合法
墨西哥	墨西哥共产党	5,000	独立的	合法
	社会主义人民党	10,000	亲莫斯科	合法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社会党	60	亲莫斯科	非法
	尼加拉瓜共产 党⑦	40	亲莫斯科	非法
	桑地诺民族解放 阵线	50	亲卡斯特罗游击队	非法
巴拿马	巴拿马人民民主 党	500	亲莫斯科	非法
	巴拿马卡斯特罗 革命统一运动	50	亲卡斯特罗	非法
巴拉圭	巴拉圭共产党	3,500	主要亲莫斯科	非法
秘鲁	秘鲁共产党	3,200	亲莫斯科	合法
	秘鲁共产党 (马列)	1,200	亲北京	合法
	左派革命运动	不详	亲卡斯特罗	合法
	民族解放军	不详	亲卡斯特罗	合法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没有共产党			
乌拉圭	乌拉圭共产党	22,000	亲莫斯科	非法
	民族解放运动 (图帕马罗斯)	800--1,000	独立的	非法

国家	党的名称	人数 (约计)	立场	是否合法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共产党	8,000	亲莫斯科	合法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4,500	独立的	合法
	前进联盟	不详⑧	共产党阵线	合法

① 西班牙文本为十二万。——译者

② 非正式估计。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独立性减少,比古巴革命以来任何时候都要亲莫斯科。

⑥ 人民进步党受大约一百名共产党中坚分子的控制,但得到大量选民的支持。

⑦ 其前身为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劳动党,1971年改用现名。

⑧ 1968年12月大选期间,前进联盟获得十万三千三百六十八张选票。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情报和调查局:《共产党组织在世界上的实力》,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3年。

